

EDWARD SAID

TARIQ ALI

与
爱德华·萨义德
谈话录

Conversations with
Edward Said

[英] 塔里克·阿里 著
舒云亮 译

SAID

ALI

作家出版社



S码书房013
阿里作品02

他倔强、暴躁、富有魅力，在世界各地留下了众多的粉丝和追随者。

——美国纽约《村声》文化杂志

我们这个时代最有争议和影响力的知识分子。

——英国《卫报》

我一直喜欢被遗忘、被忽略。

——爱德华·萨义德



图书主页

ISBN 978-7-5063-7875-8



9 787506 378758 >

定价：24.00元

与
爱德华·萨义德
谈话录

Conversations with
Edward Said

[英] 塔里克·阿里 著
舒云亮 译

作家出版社

(京权)图字: 01-2014-846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与爱德华·萨义德谈话录 / (英)塔里克·阿里著; 舒云亮译.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5.3
ISBN 978-7-5063-7875-8

I. ①与… II. ①塔… ②舒… III. ①萨义德, E.W. (1935~
2003) - 访谈录 IV. ①K837.1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49719号



Conversations with Edward Said By Tariq Ali

Copyright © Tariq Ali 2006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5 by THE WRITERS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与爱德华·萨义德谈话录

作者: [英]塔里克·阿里

译者: 舒云亮

出版统筹: 文建

责任编辑: 赵超

装帧设计: 吴元瑛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刷: 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25 × 180

字数: 73千

印张: 4.375

版次: 2015年5月第1版

印次: 2015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7875-8

定价: 24.00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英文版编者话 目录

英文版编者的话	/ 001
怀念爱德华·萨义德	/ 003
一、关于成长	/ 019
二、关于音乐	/ 040
三、关于文学	/ 056
四、关于巴勒斯坦	/ 072
五、关于《东方主义》	/ 097
六、关于容纳	/ 104
七、关于知识分子和政治	/ 110
八、关于美国	/ 116
九、关于身份	/ 125
十、关于个人	/ 127

英文版编者的话

这是爱德华·萨义德与塔里克·阿里的一系列谈话，发生在一九九四年六月萨义德的河滨公寓里，差不多是在他与癌症抗争失败的十年之前。当时，谈话的内容经编辑后拍成了一部纪录片，题目是“与爱德华·萨义德谈话录”，由万隆制片公司摄制，在英国电视台四频道播放。

显然，根据影片的摘录来看，原先的谈话时间更长、内容更丰富，我们当即就感觉到，这是两位著名的知识分子一次发自内心的、不可重复的和深入透彻的焦点访谈。由于萨义德和阿里都是思想家、作家和政治活动家，两人虽然都是在东方文化中长大，但现在都生活和工作在西方，都同情左翼，都坚决捍卫正统之外作为批评家的权利，这就构成了一次很有意思的谈话。

我们对塔里克·阿里提出要求后，发现了这些未经编辑的材料，还有一份稍加编辑的原稿，记载了他们之间精彩谈话的全部内容。这是他们两人之间互动的一次轻松愉快的倾心交谈，有充裕的时间。为原滋原味地保留口语化韵味和谈话的节奏，包括偶尔的语法自由发挥，我们选择了不对文本进行大手笔的“整理”。这样，读者就能够听到两个清晰的声音，还有他们的怪异特征和性格。

怀念爱德华·萨义德

爱德华·萨义德是我多年的朋友和同志。我们是一九七二年在纽约的一次研讨会上认识的。即使当时是在动荡的年代，他也与众不同，特别讲究衣着，从头到脚的衣裤鞋袜每一件都经过了精心挑选，几乎从来没有看到过他的另外装束。一九九七年在贝鲁特为爱德华举办的一次会议上，他坚持要陪同我和埃利亚斯·库瑞^①去

① 埃利亚斯·库瑞：(1948—)黎巴嫩小说家、剧作家和文艺评论家。
——译者注（后文注释若无说明，均为译者注）

游泳。当他穿着泳裤走出来时，我问他为什么浴巾不搭配。“入乡随俗嘛。”他轻松地回答。但在那天晚上，在他朗诵他的阿拉伯语回忆录手稿《格格不入》^①的时候，他的穿着是无可挑剔的。此后，即使在与白血病做长期斗争期间，他也一直保持穿戴整齐直至最后时刻。

在最后的十一年里，人们已经习惯了他的生病、经常性的住院、愿意试用新药和拒绝失败。人们不由得认为，他一定能够战胜病魔。去年，我碰巧在纽约遇到了萨义德的医生。在回答我的提问时，他说爱德华的疾病从医学上来说是不会幸存的。但他那坚强不屈的斗士精神和要活下去的意志，使他支撑了那么长的时间。萨义德到处旅行。与往常那样，他谈论巴勒斯坦，也谈及三种文化^②的凝聚力，并坚持认为这三种文化有许多共同点。病魔正在吞噬他的肌体，但来听他言论的人没能看到这个过程。我们是了解他的，知道最好不要把他当成

① 萨义德回忆录《格格不入》（Out of Place）的电影中文译名是《乡关何处》。

② 三种文化：这里是指阿拉伯文化、犹太文化和西方文化。

垂死的病人。当邪恶的癌细胞最终夺走他生命的时候，我们内心的震动是很强烈的。

萨义德与西方政治和文化，以及与阿拉伯世界的争论，是他自传里最重要的特征。“六日战争”^①改变了他的生活——之前他没有介入政治。他父亲沃第尔·萨义德是巴勒斯坦的基督教徒，为躲避奥斯曼帝国的征兵和被派去保加利亚打仗，他于一九一一年十六岁时移民美国，成为美国公民并在美军服役，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法国打仗。后来，他去了耶路撒冷，爱德华就是一九三五年在那里出生的。老萨义德从来没有像某些贬低者所指责的那样，装作是穷困潦倒的巴勒斯坦难民。他们全家迁去了开罗，沃第尔·萨义德成功地做起了文具生意，把爱德华送进了精英的英语学校。父亲很严厉，在他的眼里，男孩必须绝对守纪律，放学后不能与小朋友一起玩耍。所以爱德华的童年生活很孤独，课余时间就与笛

① “六日战争”：也叫“六五战争”或“第三次中东战争”，发生在1967年6月5日至10日的六天里，结果以色列获胜，阿拉伯国家战败。

福、司各特、吉卜林、狄更斯和曼恩的小说为伴。他是
以英国威尔士王子的名字被命名为爱德华的，虽然父亲
崇尚君主主义，但一九五一年时却把他送去美国接受教
育，而不是英国。萨义德后来说，他不喜欢那种“清教
徒式和虚伪的”美国新英格兰州寄宿学校：这是“破坏
和令人迷失方向”。到了那个时候，他认为自己已有自
知之明了，“道德上和体格上都有缺点”。在美国时，他
不得不调整自己去适应“体制和环境”。

一九六七年的人生转折点

然而，他在美国名牌大学里如鱼得水，先是在普林
斯顿大学，然后是哈佛大学。他后来说，他在那里获得
了以德国哲学传统的方式学习比较文学的机会。一九六
三年，萨义德开始在哥伦比亚大学执教，三年后他的第
一本有关康拉德的书出版了。一九六四年，在为纽约电
视台四频道录制一段谈话的时候，我问及了此事。他把
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七年在哥大的初期几年，描绘成

“《道林·格雷》^①的时期”：

塔里克·阿里：那么，你内心的一个人物是比较文学的教授，与其他教师一样，正常去授课；而另一个人物则在你的内心成长，是你把这两个人物分开的？

爱德华·萨义德：我必须这样。另一个人物是没有位置的。我已经有效地切断了与埃及的联系。巴勒斯坦不存在了。我的家庭在埃及和黎巴嫩两地交替生活，我在这两个地方都是外国人。我对家庭的生意不感兴趣，所以我留在美国了。一九六七年之前，我真的认为，我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工作上也没有多大的成就。我的好多学术大师，如埃德蒙·威尔逊、以赛亚·伯林、雷茵霍尔德·尼布尔，都是狂热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不但亲以色列，而且发表了恶毒的攻击阿拉伯人的文章。我只是知道了这些事情，我不想参与政治。

① 《道林·格雷》：电影故事的主人公道林·格雷是美少年，为让自己保持青春貌美，他出卖灵魂、耽于享乐、自我放纵。

“六日战争”爆发的时候，我在纽约，心灵上受到了极大的震动。我所了解的世界，在这个时刻结束了。我在美国已经好多年了，现在我开始去接触其他阿拉伯人。到一九七〇年的时候，我已经完全投身到政治之中，投身到巴勒斯坦的抵抗运动之中。¹

一九七五年，他出版了一本书，叫《开始》。这是一部史诗般的著作，论述了由“出发点”引起的一系列问题，把奥尔巴赫、维科和弗洛伊德的思想与大量的现代小说的阅读结合起来了。此外还有《东方主义》，两本书都是这种形势下的产物。一九七八年，萨义德已经是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委员了，这个时候出版的《东方主义》，结合了这位政治活动家的雄辩口才和他的文化评论热情。有一次我告诉他，对许多南亚人来说，与早期东方主义英国学者的问题，并不是他们的帝国主义思想，而恰恰相反是他们在政治上太正确了：对他们正在翻译的梵语文本的过分敬畏。萨义德笑了，他坚持说，这本书在本质上是要力图削弱西方对东方阿拉伯世界的想当然。对东方的论述——这方面法国哲学家和历史学

家福柯的影响很大——是在拿破仑征服埃及后的两百年间在英国和法国建立起来的，以反对阿拉伯世界的方式，成为英法实施统治和维持欧洲文化身份的一个工具。²为此他着重强调了对中东及其文化的异国化、庸俗化和曲解。在西方主宰一切中以歪曲和工具主义的观察基础上，把帝国主义的猜测描述成普遍的真理是一个谎言。

《东方主义》在学术上引起了轰动。成功无疑使萨义德深为感动和高兴，但他十分清楚，他的著作被大量滥用，因此他经常否认由此引起的更为恶劣的结果：“怎么可以指责我反对‘西方文明’呢？人人都知道我是喜欢康拉德的。”然后他就会去看后现代主义批评家的名单，挨个猛烈抨击他们对身份的看重和带有敌意的叙述。“把这些全都写下来。”有一次我这么告诉他。但他回答说：“那你为什么不写呢？”我们录制下来的这段对话则更为克制：

塔里克·阿里：一九六七年的“六日战争”改变了你，使你走上了成为巴勒斯坦代言人的道路？

爱德华·萨义德：首先是阿拉伯，然后才是巴勒斯坦。

塔里克·阿里：《东方主义》就是在你投身于新的工作之后写出来的。

爱德华·萨义德：我开始有条理地阅读关于中东的书籍都写了些什么。结果发现与我的经验都对应不起来。到了七十年代初期，我开始明白，曲解和失实是系统性的。这种思维系统的很大一部分，是西方整个企业界在与阿拉伯世界打交道时所特有的。我更加坚定地认为，文学研究基本上是一项历史的任务，而不是美学的任务。我依然相信美学的作用；但“文学王国”——“因其自身的缘故”——则是错误的。严肃认真的历史调查，应该从文化已经无可挽救地卷入了政治这个事实开始。我的兴趣一直是在西方的典律文学方面，阅读的不是需要崇敬的杰作，而是需要掌握历史重心的著

作，这样就会产生共鸣。但我也认为，你必须喜欢这些书，在乎这些书，才会去阅读这些书。

《文化与帝国主义》是在一九九三年出版的，这部著作超越欧洲与中东的界限，延展《东方主义》的争论核心，描述了更为普遍的西方世界与其海外领土之间的关系。这部著作是在不同的政治时期写的，引起了一些指责和攻击。在《泰晤士报文学增刊》举办的一次庆贺会上，英籍捷克裔哲学家和人类学家欧内斯特·盖尔纳认为，萨义德应该对起到了现代媒介作用的帝国主义“至少表示一下谢意”——对此，双方毫不留情，各不相让。后来，盖尔纳试图和好，但萨义德没有宽恕。积怨肯定是很深了，萨义德的一贯做法是以牙还牙。

但现在，关于文化的争论已经因为巴勒斯坦发生的事件而黯然失色。在我问他一九一七年对他意味着什么时，他毫不犹豫地给出了回答：“《贝尔福宣言》。”萨义德对巴勒斯坦的写作，与他以往的写作完全不同，语言简约、引经据典，充满了热情。这是他的事业。在《和平的终结》、《谴责受害者》和其他五六本书中，在他的《金字塔报》专栏和论文中，在《伦敦书评》

杂志之中，自一九六七年点燃的烈火烧得更旺了。他帮助了一代人去了解巴勒斯坦的真正历史，作为自己人民和被占家园的编年史写作，使他赢得了全世界的尊敬。巴勒斯坦人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犹太人大屠杀的间接受害者；但西方政治家似乎大都并不在意。萨义德刺痛了他们的集体神经，因此他们不喜欢他。

反对巴以《奥斯陆协议》

易卜拉欣·阿布-卢格霍德和埃格巴尔·艾哈迈德是萨义德的密友，常常给他很好的建议，但他们相继于一九九九年和二〇〇一年去世。萨义德非常想念他们，他们的离世，使他更加坚定了继续对敌人进行口诛笔伐的决心。虽然他已经当了十四年的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独立委员，并帮助修饰了一九八四年阿拉法特在联合国大会的发言稿，但他对大多数巴勒斯坦领导人缺乏战略眼光提出了越来越多的批评。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与以色列总理拉宾在白宫草坪上握手之后，萨义德立即表示这是“粗俗的作秀”，他把《奥斯陆协议》描述成是一九九一年海湾战争之后由美国和以色列强加给战败国

的，是“投降的工具，是巴勒斯坦的《凡尔赛条约》”，只给巴勒斯坦提供狭小的家园。而以色列只要有美国的武器和资金的支持，是不会让步的。³（阿拉法特的助理纳比勒·沙阿斯对《东方主义》发表更为反动的批评，他回应说：“萨义德应当坚持文学批评。毕竟，阿拉法特是不会屈尊去讨论莎士比亚的。”）历史证明了萨义德的分析。他对阿拉法特领导层最尖刻的批评文章，发表在二〇〇一年的《金字塔报》上，谴责《奥斯陆协议》仅仅是对占领的一个重新包装，“把在一九六七年攫取的百分之十八的土地，作为筹码提供给腐败的、像二战时期法国维希政府那样的阿拉法特政权，他的当政基本上一直是代表以色列，对人民群众实施监督和收税：

巴勒斯坦人民应该过上更好的生活。但我们必须清楚地说明，在阿拉法特那帮人的统治下，这是没有希望的……巴勒斯坦需要的领导人，应该是来自人民和真正与人民站在一起的人，应该是脚踏实地地进行抵抗的人。而那些热衷于做生意和追求享乐的脑肥肠满、叼着雪茄的官僚，已经完全失去了体

面和信誉……我们需要一个团结的领导班子，能够认真去思考、计划和决策，在以色列肆意屠杀巴勒斯坦人民的时候，不会去对教皇和乔治·布什卑躬屈膝……解放以占领土的斗争，是值得每一个巴勒斯坦人去为之努力的。⁴

哈马斯（伊斯兰抵抗运动）能做出认真的选择吗？“这是反对以色列占领的抗议运动。”萨义德告诉我：

以我的观点，哈马斯要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的想法还根本没有成熟，难以说服那里的居民。没人会去认真考虑他们的计划。我是已经问过他们了，如果你再去约旦河西岸或其他地方问他们：“你们的经济政策是什么？你们的电厂和住房计划是什么？”他们会回答：“哦，这个我们正在考虑之中。”没有可标之为“伊斯兰”的社会项目。我认为他们是清醒的，在他们看来，伊斯兰是打破现在的僵局和执政党平庸没落的一个机会。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现在已经毫无希望地受到了损害，而且缺乏信誉，就像美国的附庸国沙特阿拉伯和埃及那样。

在以色列反复要求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对哈马斯

和伊斯兰圣战采取严厉措施的背后，萨义德觉察到了以色列军方颇为欣喜的“某种像是巴勒斯坦会发生内战那样的希望”。但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对于巴勒斯坦固执地拒绝接受“是被打败的民族”——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对他们的描述——对此他还能够进行庆祝。他也看到了希望，在由穆斯塔帕·巴格哈提领导下的全国政治倡议运动中，巴勒斯坦的政治将变得更富创造性：“这里的愿景不是在耶路撒冷由以色列占领下、在难民遍地的百分之四十的土地上制造出一个临时国家，而是尽可能在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共同参与之下，建立一个从军事占领下解放出来的主权领土国家。”⁵

萨义德的去世，使巴勒斯坦民族失去了其在北半球最善于表达的声音，巴勒斯坦人民将继续默默无闻地承受苦难。在以色列看来，他们是劣等民族；在美国看来，他们都是恐怖分子；在腐败的阿拉伯政权看来，他们是一个继续存在下去的谜团。萨义德在最后的写作中，强烈谴责伊拉克战争及其多次的道歉。他为远离暴力和谎言的自由而呐喊。他知道，对巴勒斯坦和伊拉克

的占领，使得中东地区的和平希望更加渺茫了。他的声音是不可替代的，但他的遗志将会继承下去，在他的身后将会有千万个萨义德。

（摘自英国《新左派评论》杂志24期，2003年11-12月）

注释：

1. 这里以及下面的引语，源自万隆制片公司的电影《与爱德华·萨义德谈话录》。影片是在他的河滨公寓里拍摄的，那天天气闷热，摄影机开始转动时，萨义德脱去西装，摘下了领带，在家里创造了一种快乐的气氛。（这些谈话的完整录音稿，就是本书）——作者注
2. 因此，在一八八一年后出任英国驻埃及总领事达二三十年的克罗勋爵说：“这个欧洲人是很讲究逻辑的；他对事实的陈述是清楚的，没有含糊之词；他是天生的逻辑学家……东方的思想，如同他那风景如画的街道那样，显然是讲究对称……在盘问的过程中他常常会失败。”《东方主义》伦敦2003年版第38页。——作者注
3. 《伦敦书评》1993年10月21日。——作者注
4. 《新左派评论》杂志19期，2001年9-10月。——作者注
5. 《伦敦书评》2003年6月19日。——作者注

（爱德华·萨义德是我们这个时代著名的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他的写作范围很广，文学、音乐、历史和巴勒斯坦政治都有涉及。《东方主义》现在成了一部世界经典。一九九一年他被诊断出患有白血病。我们在纽约采访了他）

塔里克·阿里：你什么时候得知自己患病了，爱德华？

爱德华·萨义德：是在一九九一年初秋。通过一次例行的体检，发现我患上了白血病。

阿里：当时，医生是怎么说的？

萨义德：医生显然是想努力淡化我的病情，说这是一种慢性病，并没有其名字听起来那么可怕。当然，我很惊恐，在大约六个月时间里到处求医，接受了无数次化验，为的是确认这个诊断。那时候，我已经习惯了患上这种疾病的念头。最后，我找到了一位很好的医生，这是极为重要的，因为这是一种长期的疾病。因此，这病实际上是治不好的，就像糖尿病那样。他确实很优秀。直到最近一段时间，我基本上不需要什么治疗或化疗。差不多在患病两年半之后，我才需要进行化疗。

阿里：化疗有什么效果？

萨义德：并没有人们所想象的那么坏，主要是虚弱。我感觉很疲惫，还有一些恶心。除此之外，虽然我认为随着化疗的加重现在我应该减慢节奏，但我一次约会也没有取消过，我还保持着我的工作日程。

一、关于成长

阿里：回顾你的童年，爱德华，你对耶路撒冷的最初记忆是什么？

萨义德：嗯，主要是房子。因为我不是在医院而是在家里出生的，由我家从外面叫来的一个犹太接生婆接生的。我母亲对医院印象不好，因为她之前的一个孩子死在了医院里。所以，我是在家里降生到了这个世界上。

我最初的记忆，是我家在一九四七年年年底迁走之前一直居住的房子。那是在耶路撒冷的西部，一九四八年初冬我们的房子被占领了，成为以色列领土。幼小的我，跟随全家迁往埃及。父亲的生意是在开罗和耶路撒冷，所以我早期的印象是开罗和耶路撒冷的交替。当我长大一些以后，开罗的印象就比耶路撒冷的多了。

阿里：在你成长的时候，耶路撒冷这个城镇怎么样？

萨义德：嗯，我对它从来就没有怎么在乎过。我认为这是一座庄严的，而不是欢乐的城市。时至今日，在我的心目中，死亡和宗教都不是我所喜欢的。没完没了的教堂和主日仪式，许多身穿黑衣的妇女，许多关于人们的行为规范、虔诚和节俭的讲课，当然还有弥漫在阿拉伯文化之上的英国影响。我们是一个属于基督教的少数群体。

阿里：这是马龙派——

萨义德：不，不是的。恰恰相反，应该是圣公会的。我们家原来信奉希腊东正教，与大多数巴勒斯坦基督教徒那样，可我爷爷在十九世纪末叶皈依了英国国教。他们被称为是先令^①的教徒，因为来到巴勒斯坦的基督教传教士，在对穆斯林和犹太人传教的时候都遭遇了极大的挫折，于是他们转向了其他的基督徒。而我们是希腊东正教，是可以皈依英国国教的“余党”。他们也给教徒带来了好处。在英国国教，这个好处就是教育。

所以，父亲就进入了耶路撒冷的一所英国殖民地男子公学，叫圣乔治学校。后来我也上了这个学校。呃……我是在对我家影响很大的英国体制下长大的。当时，我还很幼小，可我的所有男性同辈亲属——堂兄弟和表兄弟——都进入了那所学校。我遵循悠久的传统，但这方面并不十分突出。实际上，上学的第一天我就遭到了戒尺击打的惩罚，因为我在祷告的时候说空话了。我在中东地区上过学的所有学校，还有我上过学的所有

① 先令：1971年前英国的货币单位，1英镑=20先令，1先令=12便士。

英国学校，都有许多体罚学生的规定。

阿里：这些学校是模仿——

萨义德：模仿英国公学，但模仿得很拙劣，因为没有英国学生。校长都是英国人，学校只招收男生。圣乔治学校是某种贵族学校。巴勒斯坦的精英家庭把他们的孩子送进这种学校。我在埃及上的维多利亚学院，也是中东地区的某种贵族学校。学生来自叙利亚、黎巴嫩、约旦和沙特阿拉伯，一时间他们都成了同学，形成了一个混血的人群。所以，学校里至少有一种感觉——不是确切的自由化，而是多样化。

阿里：这些都是寄宿学校吗？

萨义德：是的，是寄宿学校和全日制学校。可我一直是走读生。

阿里：对学生产生的影响是很不相同的，在某种程

度上寄宿生……

萨义德：嗯，我认为寄宿生日子很难过。我至少还可以每天回家。在耶路撒冷和开罗，上学时间是早上七点和七点半。下午放学很晚，差不多已是晚上了。在我的印象中，寄宿生是很惨的。首先他们得忍受很难吃的伙食，宿舍纪律严格，经常会有体罚发生，还有教务长——我时常成为教务长的教育对象，他们是我生活中不愉快的记忆。

阿里：你们家为什么要离开耶路撒冷？

萨义德：嗯，我们大多数的家庭成员之所以要离开耶路撒冷，是因为他们不得不离开。我们的住宅小区，是完全没有防护的。我想，大概是在一九四八年二月，我们的小区落入了哈加纳^①的手中。记忆中，小区里没有民兵，没有任何形式的有组织抵抗。我们居住在耶路

^① 哈加纳：以色列建国（1948年5月）前巴勒斯坦犹太人社团伊舒夫的防卫组织。

撒冷西郊一个富裕的但人口不多的阿拉伯社区。事实上，耶路撒冷的西部全是阿拉伯人。这是许多人不知道的。我们今天听说的是耶路撒冷东部，但在当时，耶路撒冷西部的四个大区都是阿拉伯人。我们的社区居民最稀少。一九四七年下半年战斗爆发的时候，那里是再也住不下去了，人们还有一种强烈的恐慌。我们家在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底离开了。其实我们已经在开罗安家了，所以这次我们只是返回开罗而已。但住在宅子里的其他家庭成员则离开了，因为再也无法住下去了。到了一九四八年早春，整个大家庭，包括父系亲属和母系亲属，都成了难民。他们最后的安顿地点，有的是埃及，有的是约旦，还有的是黎巴嫩。

阿里：那你是如何完成从耶路撒冷到开罗的转变的？你是不是更喜欢开罗这个大城市？

萨义德：我更喜欢开罗。我的意思是，在我看来，首先开罗是一个大城市。在那里，我感觉更像是在家里。说话也更悦耳——我指的是埃及的阿拉伯方言——

至今我依然最喜欢这种方言。开罗是一个大都会。耶路撒冷只是外地的一个首都。我们家和我们家的亲戚如有重要的购物，都会去开罗。

耶路撒冷受到了战争的严重影响，英国人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存在，使得小小的阿拉伯人社区感觉很孤独。所以我在开罗感到了更多的快乐，虽然我在学校里要遵守维多利亚式的严格管教，没有太多的自由，但还是要比在耶路撒冷时更加自由一些。

阿里：哪方面的自由？

萨义德：嗯，文化生活更加有趣。虽然我还幼小，但根据我的记忆，耶路撒冷没什么文化生活。在开罗，人们感觉是在一个大文化和大文明之中。在保留阿拉伯气氛的同时，开罗具有浓厚的欧洲气氛。浸泡在城市文化之中，进入一所大得多的学校，与不同的学生群体一起，我感觉在开罗会有更多的发展。老师也比原来的更好了。对我来说，开罗在各方面都是更加快乐的地方。

阿里：在开罗的维多利亚学院，哪个老师对你产生了特别的影响？

萨义德：没有。C.L.R.詹姆斯有一次问了我这个问题，应该说在我的整个学生时期，我从来没有对哪个老师有过特别亲近或欣赏这类事情。我一直感觉我与老师之间是对抗的。事实上，我记得我上过学的每一个学校，老师都特别关注我。我是一个很顽皮的学生，我感觉老师想努力打掉我的锐气。我记住的这方面事情，比哪个人对我好或者对我特别感兴趣多得多。

阿里：或者在学习上鼓励你——

萨义德：没有。说实话，我认为上学时我的学习积极性都是来自我自己，不是来自学校。我的意思是，学校提供了条件。可我的阅读兴趣是自己培养起来的。我的学习动力其实不是在课堂上获得的，总的说来，我感觉上课时很无聊。我还发现老师大都智力有限，不及许多学生。

阿里：那么运动呢？网球？板球？

萨义德：运动我是全都参加的。父亲对此要求很严，十四五岁时，我就学会了你能够想到的所有运动项目。我的意思是，跟随教练和职业运动员后，这些运动我全都学会了。我学过拳击、板球、网球、足球、游泳、骑术，各种骑术，包括马球，还有其他等等。我学了许多运动。我并不是对哪一项特别在行。我还有点叛逆，尤其是在团体运动项目中。可我很喜欢运动，直至后来受到了严格的管制，没有乐趣了。

阿里：给我谈谈你父亲，爱德华。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干什么的，他对你有什么影响——

萨义德：父亲是一个非凡的人，我对他知道得不是很多。我出生的时候，他已经老了，已经是四十岁了。母亲比他年轻二十岁。我经常发现他很神秘。他言语不多。他是在一九一一年从巴勒斯坦移民到美国的，为的

是逃避奥斯曼帝国的兵役，他在这里度过了九年或十年的光景，其间包括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两年，当时他跟随美国远征军在法国服役。他成了美国公民，然后据我记忆他大概是在一九二〇年回到了巴勒斯坦。

阿里：当时他在纽约吗？

萨义德：不，他大多数时间是在克利夫兰，但他很少提及过去的事情。我的意思是，他在这里度过了九年或十年的时光，但对此我知道得很少。然后他就回到巴勒斯坦，打理家庭的生意。二十年代后期，生意扩大了，他与人合伙把生意做到了埃及，很快埃及的生意规模超过了巴勒斯坦。

阿里：生意？

萨义德：生意。

阿里：什么生意？

萨义德：主要是办公设备的生意。他善于对付官僚。例如，父亲抵达埃及的时候，埃及的官员还在使用钢笔书写文件，而且他们没有文件归档系统，于是我父亲引进了归档系统，他还引进了阿拉伯语打字机，不管是政府还是企业需要，只要是现代化的办公设备生意他都做。这方面，他做得很出色，他是我遇见过的最聪明的生意人。他是一位商业大亨。

阿里：作为父亲，他怎么样？

萨义德：对我来说，他是相当严厉，非常严厉的。我有四个姐妹。可他对我的姐妹偏袒得很多。在他看来，我是经常需要改造的。他会用许多方法来关注我身体的某些部位，比如我的背部。他很遗憾，我没有军人那样挺拔的背板，所以我童年的许多时间他都在训练我的脊背。“训练一下”，他会这么说。如此等等。我的意思是，他很少说话，在说话的时候，他都是用命令的方式，比如，“去打板球”。我说的是，他似乎记住了电影

《汤姆求学记》的台词！这样的事情还有好多。

小时候，我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为的是培养一种坚强的性格。我被认为太软弱了，我被认为太优柔寡断，我没有意志力，我没有自决力，我没有自我感觉。于是父亲就集中对付这些事情。当然，结果我们之间产生了相当大的隔阂。

然后——我认为是他的主意，在我十五岁的时候，他把我送出了家门。我被送出了家门，这是我生活中最可怕的经历，在十五岁的时候，我被送去了美国。如同他所说的，他一直认为，不管怎么样，这能使我走出家门。于是我在美国上了一所寄宿学校。

阿里：根据你刚才的回答，我正要问你这个问题呢，因为根据你们家的情况来看，我一直纳闷，为什么要送你去美国，而不是英国？

萨义德：嗯，这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我父亲，别忘了，他是美国公民，他感觉既然我们已经从他那里继承了美国公民的身份，那么美国就是我应该去的地方，虽

然我们在美国没有任何亲友关系，我也从来没有到过那里。另一个也是比较重要的原因，是我已经在英国教育体系中失败了。那时候，我们在谈论的是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的事情，像开罗的维多利亚学院和巴勒斯坦的圣乔治学校那样的英语学校和英国公立学校，是与普通教育证书^①挂钩的，与牛津和剑桥的证书挂钩的，可我在学习上和心理上与英国教育系统格格不入。一九五一年初，因为违反纪律，我被撵出了维多利亚学院的大门。当时，我感觉在这个系统中我的未来产生了危机。因此，由于美国公民的因素和我在英国教育系统中的失败，我被送到了美国。

阿里：送来美国的感觉怎么样？

萨义德：很可怕，我认为我真的是一直没有恢复过来，因为这是决定性的……对我来说，要离开我熟悉的一切和喜欢的一切。尽管我的童年悲惨又艰苦，但去美

^① 普通教育证书：使用英语教育系统国家的考试制度，1951年起在英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实施，后推广到英国各殖民地。

国新英格兰州一所清教徒式的寄宿学校上学——我之前从来没有见到过下雪——去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去一个清教徒式的但在我的心目中同时也是伪善的地方，去与和我没有任何关系也从来没有遇到过的美国人相伴，我感觉如五雷轰顶，一下子迷失了方向。一生中我第一次感觉到，即使我的性格很有问题，而且我还有心理上和体力上的瑕疵，这事已经是敲定了。在美国，我不得不努力使自己适应这个系统，这是一场新的战役。

阿里：那么你在寄宿学校起步，后来进入了普林斯顿大学和哈佛大学——

萨义德：是的，中间没有停顿过。结果，我取得了学习上的好成绩。我认为这比英国的教育体系容易得多了，英国的体系压力大得多。来这里——不是寄宿学校，而是上大学以后的最大好处，是相对的自由宽松。我的意思是，我不必在某个时刻返回宿舍，我不必在某个时刻起床，诸如此类。我的整个人生以前一直是那样的，过着一种刻板的生活。那是一种军校般的生活。在

我童年的记忆中，全是这种事情。例如父亲是完全禁止休闲这个念头的。我一分钟也不能闲着。他口头禅是：“空闲的心灵是魔鬼的工作室。”所以，即使在家里穿晨衣也是父亲所禁止的。

阿里：但这是对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拙劣模仿，爱德华！

萨义德：他很固执，非常固执。当然还有我母亲，她是唱红脸的，起到和事老的作用，总是努力护着我。但最终是父亲获胜。让我脱离母亲的保护和走出家门，我认为是父亲做出的决定。

阿里：那他对你母亲的感觉如何？

萨义德：嗯，我认为母亲对我的任性有某种幽默感。我今天的所有成就，音乐、文学和思想方面的成就，真的是应该归功于母亲。母亲是我年轻时最密切的同伴。我其实没什么朋友。有趣的是，我有时候会回想

起年轻时的那些日子。除了在学校里，我与同辈人或同龄人的相处时间是很少的。放学后我没有朋友，于是母亲填补了这个空缺。她总是为我提供各种机会，如音乐。在我练习的时候，她就会坐在我旁边。

阿里：她自己演奏吗？

萨义德：是的。父亲和我家父系的人，全都是音盲，对音乐一窍不通。可母亲家的人都是懂音乐和文学的，所以她鼓励我学习这方面的知识。我总是感觉，她愿意听我的，而父亲在对我发火或下达命令的时候，是根本没有商量余地的。

阿里：是不是因为你母亲的影响，后来为你请了一位音乐老师？

萨义德：是的，绝对是的。母亲不但找到了一个老师，而且我的早期老师都是母亲发现的。上课的时候，她还会一起参加并进行劝说……在六七岁的时候，我当

然不是很想练习考级的。总的说来，我很早就有了乐感。纯粹是我们通过在埃及听唱片和歌剧，以及在收音机里听音乐学会的。所以，这方面我是得心应手，相当娴熟的。我的手指头并没有……但显然我必须经常练习。母亲总是坐在旁边，劝我进行练习和培训——

阿里：你在书中写到的那位老师，是波兰犹太人？

萨义德：他是后来才来的，我的第一位老师是他的一个女学生。我也是第一次从她那里听说他的。然后，在我十八九岁的时候，我开始跟他学习。他的名字叫伊格纳斯·提格曼，他是波兰犹太人，三十年代来到埃及。

阿里：为的是逃避纳粹的迫害？

萨义德：我认为应该是的。纳粹还没有真正动手，但他告诉我说，他看到了苗头。他喜欢在埃及的生活。他基本上是个懒人，可也是我所知道的最有天赋和最有感知的音乐家。我们成了很亲密的朋友。他是个单身

汉，在埃及开了一家音乐学校，对整个社会开放教学。他本人也是一位著名的钢琴家。他从来不练习。但他认为我喜爱音乐，兴趣很浓，于是我经常与他在一起，不单单是学习，而且还听他讲话，所以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系。

阿里：你来美国以后，这些关系都断了？

萨义德：是的，或者说这些关系中断了。当然，对于伊格纳斯·提格曼，我还是能够在夏天见到他的。

阿里：所以，你会回去——

萨义德：我会回去，我会去跟他学。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后，我在埃及度过了一年光景，其间主要是弹钢琴。我是跟他学习的，那时候经常看到他。后来他给我介绍了在美国的老师，于是我去朱莉亚音乐学院或波士顿音乐学院进修。但对我来说，这些老师都没有像他那么重要。我可以这样说，那时候他很可能在知识、文化和美

学上对我产生了最为重要的影响。

阿里：所以，你在开罗期间学习古典音乐，同时受到了开罗本身的音乐熏陶——

萨义德：正是这样——

阿里：——乌姆·库勒苏姆^①的音乐会——

萨义德：是啊！我参加的第一场音乐会，在我看来长得没完没了。至今我对她的感觉依然如此。我认为，当初我应该是九岁。我发觉音乐很神秘、很洪亮，还有某种程度的恳求，但有点不着边际。经典的西方传统之所以能够对我产生极大的吸引力，是因为这种形式是可以理解的，是适合——

阿里：这是有准则的——

① 乌姆·库勒苏姆：1904—1975，埃及著名女歌手、音乐家和演员，是阿拉伯世界最著名的歌手之一。

萨义德：是有准则，有框架的，我把很久以前与乌姆·库勒苏姆有关的事情联系起来，但我开始得太晚了。我对那场音乐会最清楚记忆，是抵达开罗音乐厅的情景，那是开罗市区内的一个电影院。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我们是在晚上九点半到的，但音乐会直到晚上十一点钟才开始。因此，等待的时间是漫长的，然后她开始演唱了，她的每一首歌都没有少于四十或四十五分钟！人们不禁纳闷，除了让观众昏昏欲睡之外，这哪有什么美妙可言？我猜不透，至今依然猜不透。在基本上没有变化的没完没了的重复之中，我没能得到该有的欢乐。可现在我成长了，我开始领悟其中的艺术。

阿里：那是一种令人入迷的成分。

萨义德：嗯，是令人入迷，对极了，可是完全没有进展，我认为这是其中的美感，我发觉很难理解。

阿里：但近年来，你更加欣赏她了？

萨义德：是的，这是因为怀旧。最重要的是过去的
一个声音，现在已经消失了。在埃及没有承传，没有看
得见的承传，或者至少是现在的承传，只有模仿。最
近我去了趟开罗，一天晚上我打开电视机，节目里有
一个女人，唱得与她一模一样，她成了乌姆·库勒苏姆的
模仿秀明星，但不是承传者。所以，我认为这也是很有
趣的。

二、关于音乐

阿里：人生中，你有没有想过要成为职业音乐家？

萨义德：呃，十八九岁的时候，我与提格曼经常谈论这事。可我感觉我总是有一些问题，也就是说，当音乐家会让我丢掉许多东西，知识方面的。而且小时候我也没有得到过适当的训练。假如在我九岁或十岁的时候有提格曼来教我，那么我在技巧方面的成型就会更好。十八九岁的时候，我真的是对音乐发生了兴趣，可我认

为那个时候已经是太晚了。我还认为，这对我来说是一种不可能的人生，因为这会让我几乎完全丢掉对知识的追求。在我看来，大多数音乐家，不管是在中学里还是在大学里，都是些无趣的人。除了提格曼，他是侥幸的好运气。他住在埃及，确实是学有所成，他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有一次我问他，你为什么不去以色列？在一九六七年“六日战争”之前的那几年，他生活得很不愉快。他说，我去以色列？可是以色列有许多像我那样的人！在这里，我是唯一的！所以，他是侥幸的好运气，他是不可模仿的。对他来说，激烈的竞争什么的，都没有丝毫的吸引力。到二十岁、二十一岁的时候，我就完全放弃了当音乐家的念头。

阿里：你有没有后悔……

萨义德：没有，一点也没有，绝对没有。我继续练琴，继续以各种方式爱好音乐。所以，我一点也不后悔。

阿里：在你的《韦勒克^①关于音乐的讲稿》一书中，你像许多音乐家那样谈论……我的意思是，英国音乐家哈里森·伯特威斯尔也是这个观点，即在我们当今这个世界上，在有音乐播放软件和讲究快节奏的今天……去听音乐会的兴趣已经不比从前了。为什么会这样？

萨义德：我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当今的人们很少接受过音乐的培训。这要花费很大的努力。任何音乐教育，都不是简单地学会一种乐器，达到基本的水平，比如笛子或钢琴。还要经常接触各种不同的音乐知识，学习乐理乐谱、学习音乐史、学习风格史，区分歌剧和轻歌剧、区分赋格曲和轮唱曲等等。但这些都没有进行教学。

其次，我认为大问题在于西方的经典传统是建立在排外和冷漠的基础上的，我们周围的噪音污染、广播电视的经常性打扰，以及其他形式的音乐制作，更是使它

① 雷纳·韦勒克，1903-1995，出生在维也纳，美国文学批评家、比较文学家。

雪上加霜。

我认为第三个原因是，当今的经典音乐很像老古董。我的意思是，一个世纪以来，演奏的方式和仪式、举办音乐会的形式都没有真正的大变革。仪式与陈旧的质量的结合，是年轻人所不喜欢的。我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上故意疏远了听众。这一切使得听众人数减少，使他们越来越趋向于听录音和追星，而不是理解音乐。

阿里：即兴演奏现在为什么那么少了？

萨义德：嗯，因为他们的受训方法。我的意思是，例如钢琴家——我对钢琴家比对其他乐器的演奏家知道得更多——但他们基本上是以运动员的方法训练出来的。就像一个人受过百米赛跑训练，他就得那样去做。在你努力教年轻人学钢琴时，因为竞争很激烈，不可能人人都当上钢琴家——没人想以后去当老师，学钢琴的年轻人都想成为霍洛维茨和伯恩斯坦那样的钢琴演奏家——他们在受训练时靠死记硬背学会了几首经典的曲子。他们只是想成为这些曲目的艺术大师。我的意思

是，即兴演奏、学习乐谱和沉浸到各种不同的音乐中去的想法，全都……

阿里：没有了……

萨义德：没有了。只有几个例外。我指的是古尔德。我认为，格伦·古尔德是唯一懂得各种音乐的人。他能谈论音乐，他能演奏各种乐器，他对各种模式、各种风格了如指掌，始终有一种狂热的爱好和强大的动力，不受音乐会的限制。别忘记，公开演奏的大多数钢琴家或音乐家都是默默无声的。他们只是坐着演奏。古尔德打破了这个模式。他上电视和广播，他还写作等等。

阿里：有一部关于他的新电影，即将上映……

萨义德：是啊，我已经看过了，在这里放映了大概一个月。影片描述了他的人生中各个插曲和这种狂热的动力。演奏音乐的想法确实是一种无休止的持续。在舞

台上，你演奏几个曲目，基本上是全身心投入到这几个曲目中，而不是创作或即席演奏。

阿里：歌剧作为一种艺术形式……

萨义德：嗯，我认为这是音乐中最有趣的，真的。我的意思是，在当今所有的各种题材中，这是最……从一个方面来说，这是最不同的。我说的是，作为观众，你会接收到来自四面八方成千上万的信息。有灯光，有背景，有各种剧院经历，当然还有音乐。因此，我认为这是当今所有音乐艺术中最有趣的。这是唯一可与电影和电视那样的东西提出挑战的艺术。除了个别的以外，我们知道的歌剧导演，有彼得·赛勒斯和乔纳森·米勒——我的意思是，他们之间并不是完全相同，但他们都在进取——还有法国人帕特里斯·夏侯和德国人格特·弗里德里希。大多数的歌剧导演、大多数的歌剧剧团，当然包括美国的，真的是很单调很乏味的。他们真的就像博物馆馆长，没有创新。他们没完没了地复制《波希米亚人》。但全部的剧目是多样的，如果向一位优秀

的导演提供一个像纽约都市歌剧院那样的舞台，为期两年，那么从观众的范围和兴趣来说，音乐方面就不会搞成那个样子了。

阿里：但歌剧依然是小众口味的——

萨义德：呃，这是因为歌剧成本很高。我认为，经济上是个问题，所以他们想找企业的支持。纽约都市歌剧院在做些什么呢？它是世界上著名的歌剧院之一。但他们基本上是上演真实主义的意大利剧目。他们上演威尔第、普契尼、一些美声唱法、多尼采蒂，以及贝利尼那样的剧目。在我看来，这是很可怕的。偶尔，他们也会抛出像《特洛伊人》那样的歌剧，但柏辽兹的剧本很少上演，而且他们演得不好。大多数时候，他们心里想的是如何努力去迎合赞助人的要求，上演《奥赛罗》或《阿依达》，而不是贝尔格或勋伯格的作品。

阿里：在你写作的有关音乐方面的书籍里，你详细论及了瓦格纳和他的歌剧，还与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

进行了一些辩论，阿多诺也写了许多关于瓦格纳的文章。从某种层面上来说，我自己也喜欢瓦格纳的歌剧，在某些方面，瓦格纳是最有学问的作曲家，但我们在观看和聆听的时候，是不是觉得一直有个疑问？他的歌剧里明显含有政治：关于法律、关于秩序、关于当局的一贯主张……

萨义德：有那么明显吗？我保持怀疑。当然，如果看看他写过的许多散文，你就会发现他是一个革命者——

阿里：在他年轻的时候——

萨义德：年轻的时候，甚至后来也同样。在舞台上，他也是革命者。他有一些奇怪的念头，例如拜罗伊特歌剧院的建设——这是他建设的——但在后期的生涯中他特别强调一切都不是永恒的。他提出了一个建议，要求在拜罗伊特设立一个音乐节，上演《尼伯龙根的指环》，然后把歌剧院烧毁。因此，关于法律、秩序、永

恒和稳定的念头，对他来说是完全陌生的。因为在《尼伯龙根的指环》的结尾时，这一切都是很含糊的。黄金回到了莱茵河，但河水冲走了一切。到处洪水泛滥，我们回到了起点！所以很难说是秩序的恢复。

我认为认识瓦格纳的唯一方法，是把他作为一个怪异多变的人物。按照今天的标准以令人迷惑的方式来评判，那么他在拜罗伊特想做的事情是愚蠢的！我们必须以讽刺的眼光来看待他。我同意阿多诺关于这个的说法，我们不能从正面看待瓦格纳。应该从其他角度去看，在某种体系中，他的观点与他的音乐之间的深刻矛盾是很突出的，并不是平平淡淡的。所以他变得更有趣更有挑战意义了。可我认为，他不可能成为一个理论家，因为在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中，音乐与剧本之间的冲突太多了。甚至在《帕西法尔》中也一样，这应该是他的一部关于基督教的歌剧，也被尼采攻击为某种“屈服的”歌剧。我认为，人们不应该一成不变地去进行那样的解读，而应该做许多解释工作。

阿里：可是反犹主义呢，这是没有疑问的吧？瓦格

纳的反犹，以及就德国而言的极端国家主义，他的多变性，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萨义德：是的，他的创作中有许多强烈的反犹主义情感。顺便说一下，他那个时期，欧洲大多数知识分子也有雷同的反犹主义。例如法国十九世纪著名的哲学家、历史学家和宗教学家埃内斯特·赫南。与他同时代的许多英国作家，像托马斯·卡莱尔，也同样对犹太人和黑人抱有偏见。这在他的著作中是一个共同的主题。当然，瓦格纳的情况是，因为作品中到处存在的强烈的德国排外主义，他被夸大了。他认为，作为一个德国的作曲家，他自己是在推广德国的文化，如此等等——这是很可怕的。在他的歌剧中，这方面的表现倒是不多。

最近有几位学者谈起了那些歌剧的反犹情况，对此我是绝对不会相信的。首先，这不是他的歌剧里独有的。他没有描写犹太人。我的意思是，人们说在《纽伦堡的名歌手》中，贝克梅瑟这个人物应该是代表犹太人的，但那只是暗示。在瓦格纳的歌剧中表现出来的悲观的念头和价值，应该是他的整个作品的一部分，这方

面，他与其他著名的艺术家并没有什么不同。例如，吉卜林是一位伟大的作家，但他也有悲观的念头。所以，我认为这是真实的瓦格纳。

还有些人，想把瓦格纳与某种纳粹主义直接联系起来。这个，我倒并不怎么在意。在我看来，这是荒唐的。我的意思是根本不用把它隐藏起来，装作不存在似的，而是恰恰相反，我认为这方面应该着重说明，早先我在谈论这些歌剧应该如何上演的时候，也是这个意思。这些歌剧的讽刺意义，是思想的不一致，是达官贵人的思想和堕落腐败思想的矛盾。瓦格纳着迷于这些事物的互相共存，所以使他变得既很有趣又很有问题。

阿里：人们议论颇多的另一件事，是说他的女儿和家庭是纳粹的支持者。

萨义德：哦，应该是他的儿媳，他儿子的妻子威妮弗雷德。是的，是这样。

阿里：希特勒还访问过——

萨义德：拜罗伊特。瓦格纳的家人和拜罗伊特，是唯一能让希特勒有见到亲人和回到家里那样的感觉的。他们理解希特勒，并在一九二〇年代希特勒入狱的时候站在他的一边，如此等等。是的，这都是真实的。这是历史的一部分，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形式。可我认为，如果我们仔细去看，那么每一种文化形式都是真实的。这与最邪恶的思想、运动和趋向有关，由此造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灾难性的后果。我认为，瓦格纳在这方面并不特别，只是有些事情很伤感很有戏剧性，他把事业看得比生命更加重要，因而引人注目，可我认为这并不是一个特例。

阿里：有没有你喜欢的现代作曲家？

萨义德：有啊。我特别喜欢并仔细练习梅西安的作品，他是最近刚刚去世的。我很欣赏很喜欢法国二十世纪作曲家——拉威尔和德彪西，尤其是佛瑞，他的作品被低估了。因此，梅西安和柏辽兹那样的当代音乐家对

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但美国学派并没有真正让我感动，主要是因为我认为美国学派一直在寻找一个声音——这是一种骗人的美国主义和中西部或西部的主题，是完全不能令人信服的，虽然我喜欢埃利奥特·卡特。我一直很欣赏英国的本杰明·布里顿，我认为他是一位伟大的作曲家，尤其是在歌剧的作曲方面。

阿里：德国人呢？

萨义德：嗯，当然，德国的优良传统在继续发扬，德国和奥地利是维也纳第二学派。贝尔格对我的影响很大。不单单是他的歌剧，还有他的器乐和交响乐作品。勋伯格也一样。还有韦伯恩，他们那些人也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所以，当代的作曲家我有一段时期是很感兴趣的，也是相当仔细地进行了练习和模仿，例如斯托克豪森，他的钢琴曲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我迷失了，猜不透他要把我引向何方。多年来，我一直兴致勃勃地听亨策的歌剧曲子，学习他的风格。

阿里：在你写作的音乐书中，你也谈到有些音乐家已经几乎脱离了他们自己的音乐，从演奏的方式来看，音乐的精华，那种本质的精华已经脱离了。我认为，这方面你说的是肖邦。

萨义德：是的，是肖邦。我认为他是一个完美的例子，因为以我的观点看，在十九世纪的音乐界，肖邦是一位与瓦格纳同等级的革新家，都很和谐很规范。但肖邦是细微型，而瓦格纳则恰恰相反。一切事物，初看上去都是高大的，但外皮会无休止地脱落。肖邦经济拮据，等级就低了，在我看来，这方面说得不多，也因此很吸引人。但他表达的范畴，他追求的完整性，例如序幕或者夜曲……总的说来，肖邦之所以伟大，是他带给我们的那种感觉，那种极为短暂、极为瞬间的感觉……我的体会是，他最典型的作品是即兴曲。那些曲子听起来像是即兴创作的，辐射出一种感觉……在音乐厅里，给听众的感觉是那种令人难以置信的丰富多彩的声调，以及那种放松的感觉，这真的是很神奇的。在十九世纪

的音乐界，除了他，没有人取得过这种效果。

嗯，肖邦现在已经降格为衰落一类的作曲家，更使他伤心的是，人们还把他与瓦格纳和勃拉姆斯那样的人做对比，如此等等，这样做是很拙劣的！而且在演奏他的曲子时，也是缺乏形式定律的宏大感受。我的意思是他最喜欢的作曲家，如同提格曼常常告诉我的——人们在演奏肖邦的曲子时，好像他是一块正在溶化的方糖，或者是快要晕倒的妇女，如此等等——你不要忘记，提格曼告诉我说，肖邦最喜欢的作曲家是巴赫和莫扎特！但在你慢慢地了解肖邦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对于作品的出版是很仔细的，他会安排在几个不同的地方出版，以确保版权和改编的版权都在他的手里。肖邦对于谱曲也是很仔细的……在他的所有作品中，他的方向与贝多芬的作品同样复杂和精致。最重要的是，他对自己作品的演奏更是极为仔细的。他的作品中有一种铁的定律，但没有显示出来，部分淹没在他所创作的这种特别的声音之中，已经消失了。所以，现在很少有人演奏肖邦的作品。

阿里：你演奏他的作品吗？

萨义德：我经常演奏他的作品。

阿里：你现在可以为我们演奏他的作品吗？

萨义德：现在？不，现在不行。（大笑）

三、关于文学

阿里：你是怎么接触英国文学的？又是怎么喜欢上英国文学的？

萨义德：嗯，我认为这是一个意外。我的意思是，小时候我有许多书。我是一个孤独的孩子，在我的书中，我发现我能够静下心来的是英国小说。我阅读的第一本小说是《鲁宾逊漂流记》，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读到的是一本精美的插图本。一旦读起来后，我就一口气

把它读完了。到十四岁的时候，我已经阅读了司各特的大量小说——很可能通读了司各特的全部小说，我记不清了——可我一直在看书，主要是看小说，能够到手的小说。

有意思的是，我在学校上学期间并不重视小说。我在学校里没怎么去碰小说。我记得当时读到过莎士比亚的戏剧和诗歌，但对许多小说都没有在意。然后我开始看翻译的小说，因为我当时不懂德语和意大利语，是后来才学会的，并一直保持着看译本小说的兴趣。

阿里：你什么时候认为这是你要做专门研究的领域？

萨义德：哦，我认为很可能是在我上大学期间，在我学业的中途——开始时我在普林斯顿大学读医科预科，我想学医。可我选修了大量的文学课程。在大三开始的时候，我已经把学习时间全都用在了文学上面。我主要是对小说感兴趣。到一九五七年大学毕业时，我琢磨着想上研究生院。我还没有将来要当文学教授的理想。我只是想继续阅读，所以我就继续在文学方面深造。

阿里：你有没有读过俄国小说的译本？

萨义德：读过。是母亲为我推荐的。她很喜欢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因此这两位作家的书我读得最多。直到很晚的时候，我才开始读屠格涅夫的小说。我家有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全部著作，所以我在十几岁的时候就阅读了所有的俄国名著。我清楚地记得，在我十五六岁的时候，母亲就让我读《安娜·卡列尼娜》。

阿里：你后来重读了这些书？

萨义德：我后来上高年级时重读了这些书，重新读了一遍，而且在这里的哥大和我在哈佛大学研究生院期间的各门人文课程中，我还开始教这些书。

阿里：重读的时候，发现当时有多少没看懂，一定是很惊奇的。

萨义德：或者当时看懂了多少！两方面都有。《卡拉马佐夫兄弟》有几个情景清晰地留在了我的脑海里。有些动作，托尔斯泰描写的有些纯粹的身体动作，例如对安娜在火车上的描述和那个小红包等等，我一直都没有忘记。另外，小说中很复杂的社会类型和审美类型，我当然是没有看懂的。但我如饥似渴地阅读故事的情节，并学到了许多知识。

阿里：你喜欢的，而且你也写过很多的三位作家——康拉德、吉卜林和加缪——由于各种原因，对于他们所描写的那个社会，其实他们都是局外人。这是不是巧合？

萨义德：我认为是巧合。当时，我并不怎么明白。三位作家中，我第一个接触的是吉卜林——呃，小时候我读过他的《丛林故事》；可是我的感觉并不好，因为我把小说与我自己的童子军经历联系起来。我在学校里表现不好，我是在埃及的英国童子军，老是受到

惩罚。

阿里：在开罗的英国童子军——

萨义德：是的，在开罗的英国童子军！我认为巴登-鲍威尔夫人定期来访，还有举行大型童子军集会等等。我从来没有得到过表现优秀的奖章，却老是受罚，站到团体外面去。我记不清自己都干了些什么，但肯定是表现不好，按照美国人的说法，是态度有问题。我不知道我在学校里干什么。父亲当然是很在意我这个童子军，“森林王子”和丛林的事情都是与此有关的。我真的不怎么喜欢这本书。因为这使我回想起那段特殊时期的大量经历。后来，在我读到吉卜林的其他小说，尤其是《基姆》的时候，我的眼睛为之一亮，这是我很喜欢的一本书。康拉德是我最早喜欢的一个作家。大概在我十六七岁的时候，我读到了康拉德的《黑暗的中心》。我认为，这本书改变了我的一生。当时，奇怪的是，我对康拉德一无所知，所以，直到大约五六年后我才真正了解到他的背景情况和他是什么人。可是我被《黑暗的

中心》吸引住了，我神魂颠倒，喜欢上了他的文体。显然，康拉德的散文不是英语的——我从来都不相信他是用英语写作的，我认为这是事实。我对康拉德了解得越多，就阅读得越多——二十岁、二十一岁的时候，我已经通读了他写的全部小说——到那时候，我当然知道了他原本不是英国人，他是外来的移民。我没有把我自己联系起来，但对于我与他之间的深深亲近感，显然他做出了一些回应。

阿里：可是爱德华，你为什么说他不用英语写作呢？

萨义德：嗯，这是因为有些事情……我的意思是，这使我想起了阿拉伯世界里人们的英语写作。这不是英国人的英语，对吧？这太明显了，句子也太长了……起先，我还以为他是把法语翻译成了英语——我相信——

阿里：是吗？

萨义德：是的。看看他经常有的一些文体结构，看

看那些长句……完全是普鲁斯特式的！他的文体中有一种普鲁斯特的品质。这个是他无法摆脱的！我的意思是，这是很滑稽的，福斯特还取笑过他，说形容词太多太多了，还有詹姆斯，他们全都因此而笑他，但同时也欣赏他。他们明白，康拉德真的是不守传统的，不按照“直接说话”的那种模式，他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了菲尔丁、笛福，乃至狄更斯的风格。在康拉德的小说中，说话的声音是陌生的，我从第一天开始看他的小说起，就迷上了。

阿里：在康拉德的小说《特务》中，哪些方面相当有趣，但同时也是相当传统？

萨义德：哦，很可怕。他的政治观点是很可怕的！实际上，不是以帝国为中心写作的小说，在我看来是最乏味的。《特务》和《在西方的眼中》深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但同时也在抵制这种影响。我还一直认为，《特务》是一种尽孝的小说。

阿里：我也是这么想的，为的是取悦他的主人——

萨义德：取悦，是的，他必须让这些奇怪的欧洲人高兴。可我从来就没有相信过。我感觉他根据记忆来写作，真的是出于最好的状态。康拉德的记忆总是与海外有关，与东亚、非洲和美洲有关。

阿里：吉卜林是另一种局外人，是英帝国从外部干预的一部分。我记得我在十几岁的时候读过《基姆》，喜欢书中的冒险情节，其他的内容全都忘了。多年后我重读了一遍，发觉更喜欢了。这本书为什么能吸引你？

萨义德：第一次阅读《基姆》的时候，我年纪还很小。我之所以喜欢《基姆》，是因为那种乔装打扮。别人没有基姆那种本事。基姆是巴扎尔^①的一个小孩，他是爱尔兰的孩子（我还以为他是英国的，我分不清楚：他是欧洲人）。他是个间谍，他能够以白人或印度

① 巴扎尔：中东和远东部分地区的大市场。

人的身份去旅行。我认为《基姆》是一本优秀的游记，真的，确实如此，是一次走遍整个印度的旅程，带着一种“这是我们的”（英国的），但同时也是印度的感觉。书中还有一种分享的感觉，这种殖民地背景的情况下是很稀少的。我认为，吉卜林是唯一能够这样做的人。我发觉书中充满了爱。这是一部精彩的小说，我该怎么说呢，不是复兴，而是重生。这是关于衰退的冲动获得再生的故事。还有男孩基姆，是故事的一部分。

阿里：你怎么看待他对印度的描写，还有短篇小说，他真的是喜欢那个地方——

萨义德：哦，是的，他是喜欢的！

阿里：——还有那里的人民。

萨义德：还有那里的人民。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能够区分各种不同的人群。他对年轻人和老年人的描述是相当精彩的。可我不知道他对青春期的描写是不是很

拿手——

阿里：哦，这里有些缺失……

萨义德：这里是有些缺失，但老人和年轻人肯定都是很精彩的。至于那种感觉——他可以那么认为，毕竟他就是在那种环境下长大的。我认为，他对印度的感觉，就像我对开罗的感觉：我不是埃及人，可我感觉我可以融入到那里，用不着太多担心政治。当然，时间久了，你就会明白政治起到的作用，他是政治体系的一部分，如此等等，但总的来说，你在阅读吉卜林的时候可在某种程度上忘掉政治，因为他喜欢那里的人们。

阿里：还有他所恢复的呼声！这是前所未有的。

萨义德：是前所未有的。我认为没有人能够……故事里的人物范围是令人惊奇的，嗯，这是狄更斯的风格。这种感觉是难以体会的，不像康拉德的书可以体会，他塑造的是一种原始的人性类型。在吉卜林的书

中，你不会有这种感觉。你的感觉是，他什么都在行。这是惊人的。

阿里：但在其他不是描写印度的书中，他从来没有取得过这种成就，爱德华，你说呢？

萨义德：是的，从《消失的光芒》中我们可以看到某种情感，还有他的个人信件……但我发觉他的自传倒是相当——

阿里：相当感人的。

萨义德：是很感人的，而且很有自知之明。我们能够看到他所有怪异的迟疑和转折。他是一个复杂的很难捉摸的人。他的诗歌……我并不像许多人所认为的那样觉得真的很好。他的韵文是我小时候读到的，很多都是小曲、歌谣和打油诗。我认为，艾略特^①把这些归为韵

① 托马斯·艾略特，1888-1965，美国诗人、评论家、剧作家。

文，而不是诗歌。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像康拉德那样，在他的长篇著作中，里面有一种侥幸的成分。比如《基姆》，这是唯一真正的小说。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勇敢的船长》其实不是小说。

阿里：即使还在写作的时候，他已经是很受欢迎了，他的书卖出了几十万册，他死后被埋葬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西敏寺）——然而，回过头来看，主流文化认为总体上他不能算是英国文学的大师。

萨义德：没错，因为我认为他是一个令人窘迫的人物，部分是由于他的殖民地背景，部分是由于对吉卜林很难评说，尤其是关于他的小说，关于他对英国现实主义档案的贡献。他其实是不稳定的，不像简·奥斯汀，甚至也不像狄更斯。他的家庭生活也是不稳定的。他不在乎。事实上，大都是恰恰相反。吉卜林身上有一种几乎是游离不定的品质，这样说是很公平的，这使得他处在准则之外，而且他反对简单的分类。我认为，他对社会阶层的区分也不是很感兴趣，部分是因为他对印度的

感觉，这个可以从《基姆》中体会得到，因为人们四处徘徊，在房间里进进出出——

阿里：一切都是流动的。

萨义德：一切都是流动的，我认为，这与分级颇有抵触。

阿里：有趣的是，晚年的时候，他是来美国度过的。

萨义德：嗯，这是一个疯狂的地方。（笑）他很可能喜欢这里。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

阿里：在法国，最近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纪念加缪的活动。他的一部未完成的小说，现在大张旗鼓地投入到了印刷之中，呈现出一种诡异的、矛盾的时尚，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加缪似乎已经成为法国圈子里一个受欢迎的人物。这个，你是怎么看的？

萨义德：我认为，他也只是圈子里一个受欢迎的人物罢了。在他的国家里，他肯定是个圈子里受欢迎的人物。在西方，总的来说也是如此。人们认为，他是血气方刚、孤独和荒诞的那种人，具有一种欧洲精神的人，可我认为这完全是误导。以我的观点来看，加缪一直坚持宣扬人道主义，在写作中自始至终顶住可怕的殖民主义的压力。一年前，我在巴黎的时候注意到了殖民主义怀旧思潮的泛滥。比如玛格丽特·杜拉斯那样的圈内著名人物，以及像《印度支那》那样的电影。那里有某种……嗯，就像是在美国，拉尔夫·劳伦和马球，开发具有殖民时代印记的时装、木髓太阳帽、短裤，如此等等，他们做着同样的事情。我认为这是对殖民时代的怀念。

阿里：其实，这是相当普遍的，到处都有。欧洲的其他地区也有。

萨义德：是啊，我们千万不能动摇，法属阿尔及利亚的观点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这个观点是很可怕的。这是在重新书写过去殖民时代的荣耀和安逸。这本质上是

贪图安逸、休闲和奢侈。这个，我们可以从他的小说中看到。加缪写过关于北非的一些事情，呃……是对阳光、美景和大海等等的见解。

阿里：你为什么认为，西方的文化，尤其是英国的文化，很难在美学与政治之间树立起壁垒，把两者分隔开来？

萨义德：我认为并不是很难！我的意思是，这是相当晚期才有的……我想这样的壁垒大概产生在十九世纪中期，此后继续发展，已经在英国文学中形成了制度，相对来说，也算是大学里的新生事物了——才一百年、一百二十年而已——其理念是，英国文学已经幸存下来了，而且离开了肮脏和复杂的政治关系，不像斯威夫特^①、约翰逊^②和狄更斯那样深陷漩涡之中！我认为，在文学实践中，一直都有这样制度的说法，是错误的。但我相信，这是一直存在的。在英国的政治生活和英国的文学之间，或者在英国文化和英国文学之间，一直都

① 格雷厄姆·斯威夫特，1949-，英国小说家。

② 帕梅拉·汉斯福德·约翰逊，1912-1981，英国女作家。

有直接的紧迫的政治联系。只是在最近——我认为是在受到了马修·阿诺德^①关于文化与政治分离的强烈影响之后——人们才开始认真地接受他的观点，相信文化实际上是自主的，总体上与国家的政体无关，不应该参与到政治活动中去。我认为这是一个虚假的观点，没有历史的基础。

阿里：但如今许多批评家都是坚信的，而且——

萨义德：哦，是的，不但在英国，在法国也是如此。例如当今法国令人同情的，是文化与政治的完全分离。文化偶像、文化观点和文化主题，只能以某种美学的角度去看待，把政治与文化联系起来的做法是禁止的，也是没人去尝试的。我认为在英国和美国也是如此。假如没有一些人的喧闹，假如没有一些任性的团体一直想把两者联系起来，那么我认为这种分离就会是完全彻底的。

^① 马修·阿诺德，1822-1888，英国维多利亚时期著名的评论家和诗人。

四、关于巴勒斯坦

阿里：你最终是怎么来到哥伦比亚大学的？

萨义德：是这样的，哈佛研究生毕业后，我开始申请工作。唯一能够真正吸引我的地方就是哥大，因为哥大是在纽约，而我很想在纽约工作，然后哥大聘用了我！我很幸运。我是一九六三年来这里的，此后一直没有离开过。

阿里：嗯，爱德华，你在描写那个时期的时候，把自己描述成道林·格雷^①那样的人物，有两个“你”。一个是从事英美文学的人，忙于日常工作和教学，与特里林^②见面，如此等等，但同时还有另一个人物，在你的心中成长，你长时期同时保持着两个不同的人物……

萨义德：哦，我必须这样，我的意思是，另一个人物无处安身。我已经切断了与埃及的联系，巴勒斯坦已经不存在了，我的全家有时候住在埃及，有时候住在黎巴嫩。我在两地都是外国人。我明白，我不可能在那两个地方生活和发展，我不想继承家庭的生意，于是我来这里了。我没有奢望，只想当一个普通人，有一份工作。但是到了一九六七年，那年的“六日战争”……我注意到了一些事情的发展。我注意到我所崇敬的许多文化名人，例如埃德蒙·威尔逊^③、以赛亚·伯林^④和雷因

① 道林·格雷：英国作家奥斯卡·王尔德（1854-1900）的小说《道林·格雷的画像》中的主角。

② 莱昂内尔·特里林：1905-1975，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著名教授、美国文学家和社会文化批评家。

③ 埃德蒙·威尔逊：1892-1971，美国著名评论家和随笔作家，曾任美国《名利场》和《新共和》杂志编辑、《纽约客》评论主笔。

④ 以赛亚·伯林：1909-1997，英国哲学家、观念史学家和政治理论家。

霍尔德·尼布尔^①等人，都是狂热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我注意到，他们狂热地仇视阿拉伯人，他们不单单是亲以色列，而且还发表文章，恶毒地攻击阿拉伯人。但我能做的无非是注意到了而已。政治上，我没有地方可去。我在哥大的早期，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七年的四年期间，当时的环境，政治环境，基本上是突出政治的。那时候有抗议越战的运动，但当我努力参与其中，并提出中东的议题时，常常被搁置一边。“这事情有点棘手，我们不想……”然后在一九六七年爆发了“六日战争”，我被孤立了。当时我在纽约，心情极度沮丧。在这个时刻，我了解的和知道的世界已经彻底结束了。此后不久，我开始第一次——我来美国已经十五六年了——我开始第一次与阿拉伯人接触。

我已经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美国人了，甚至是属于信奉新教的上流社会人物，接受过普林斯顿和哈佛的高等教育。阿拉伯学生没有攻读英美文学的。他们全都选择了有关中东或者是理工科的专业，与我没什么关系。但

① 雷因霍尔德·尼布尔，1892-1971，美国著名神学家和思想家。

在一九六七年之后，这里的几个阿拉伯人就开始聚会，起先主要是分析一九六七年的这场灾难。但到了一九六八年，大多数人都去参加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哥大也掀起了一场运动，而我——

阿里：是领头人物！

萨义德：不，那年我休假，离开了——

阿里：哦，是的。

萨义德：我没有参加学生运动，而是开始寻找在约旦的巴勒斯坦抵抗运动。此后不久，又是通过朋友和家人——我的一个表兄，我在一九七〇年成为巴勒斯坦运动的发言人——

阿里：是不是卡迈勒·纳赛尔？

萨义德：是的，卡迈勒·纳赛尔是我最亲近的一个

朋友，我在普林斯顿的时候，他在哈弗福德学院上学。他成为法塔赫的一名成员。因此，到一九七〇年的时候，我已经完全投入了，我已经开始了写作，在这个国家，我立即全身心地投入了。

阿里：但你没有参加反对越战的运动？

萨义德：不，我参加了。可我只是一个败兴的人物，一直如此。一九六七年以后，抗议运动一浪高过一浪，我常常去参加大型集会，与乔姆斯基^①和埃克巴尔·艾哈迈德^②一起，他们都是反对越战的积极分子。可我总是提及中东问题，因此我很难参加他们的活动。有时候我参加了，提出了我的感觉，说越南人民在遭受殖民统治，但巴勒斯坦人民也在遭受殖民统治。除了极个别人以外，大多数人都不愿意听到这话。

① 诺姆·乔姆斯基：1928—，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语言学教授。

② 埃克巴尔·艾哈迈德：1933—1999，巴基斯坦裔美国教授、政治学家、作家和记者。

阿里：你来自巴勒斯坦地区，以那种方式成长了，没有参加任何传统的政治活动，一九一七年发生的事件，即阿拉伯起义、《贝尔福宣言》和俄国十月革命，三个事件中，《贝尔福宣言》和阿拉伯起义是不是对你的一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萨义德：是的，很大。我早年最亲密的朋友——这里我指的是我在十几岁到大学期间——是巴勒斯坦的一位共产党员和博士，名叫哈达德。我的《巴勒斯坦问题》一书，就是敬献给他的。那应该是我与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的联系，对吧？当然，他是巴勒斯坦人、埃及人，对我来说，斗争是在当地，不是国际性的。

我是这么理解的，也是这么生活的。一九五九年，他在监狱里被阿卜杜尔·纳赛尔^①和埃及人拷打和杀死了，消息传来，我极为震惊。但我也很纳闷，为什么著名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要对左翼和共产党人发起大举进攻。为什么在埃及那样的地方对阿拉伯左翼人士处死之

① 伽玛尔·阿卜杜尔·纳赛尔：1918-1970，埃及共和国第二任总统，1952-1970埃及实际最高领导人。

后，苏联方面会没什么反响。这个问题没有得到答案。但使我受到冲击的一直是犹太复国主义，一九六七年之后，尤其是美帝国主义。

阿里：你是什么时候开始真正投入到巴勒斯坦的解放事业中的，不是在笔头上，而是在组织上？

萨义德：嗯，我是在一九六八年开始写作的，陆陆续续写了一些小篇幅的文章，发表在报刊上和举办讲座，如此等等，直到“黑九月事件^①”。一九六九年和一九七〇年，我都在约旦。在约旦与巴解组织的战争爆发前一个星期，我离开了约旦。我看到了战争的来临，可我要回哥大工作。当然，自一九七一年春天起，巴解组织从约旦转移到了黎巴嫩，运动又开始了。我的家庭居住在贝鲁特，我在巴解组织的所有朋友，也转移到了贝鲁特，有时候，我们每年去那里几次。我父亲就是在那个期间的一九七一年年初去世的，所以我经常去那里。

① 黑九月事件：这里是指1970年9月约旦与巴解组织发生的流血冲突事件。

我的熟人也开始聚集，我也积极地投身于巴勒斯坦解放运动，但从来不是某个政党或组织的正式成员，而是一个支持者，与运动保持一致。

阿里：你对整个“黑九月”有什么感受？因为这是约旦人利用巴基斯坦军队，都是穆斯林，要消灭整个穆斯林世界都很尊重的一个运动。

萨义德：是的。我必须说，在巴勒斯坦人看来，这事总体上是令人失望的。我坚信，约旦政权，在以色列的秘密支持下和在叙利亚某种程度的配合下，会对巴勒斯坦人动手清剿的。自一九六七年的经历之后，在阿拉伯人夸大其辞的宣传之后，我看到巴勒斯坦人也是如此。我还写了一篇文章，刊登在西班牙的《世界外交》上，这是我的早期写作，题目是《巴勒斯坦人必须面对我们在约旦的失败》，我在文章里谈及了巴勒斯坦人依赖口号而不是组织，对军事和对自我的迷信，以及对自己力量和成就的夸大，最愚蠢的是开展自相残杀的阿拉伯内战。这是体制所造成的，这个体制总是要来打击我

们。这就是我的感受，显然是很惨的。我们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和人员伤亡。但由此我也产生了怀疑，怀疑巴解组织领导人的能力和政治敏锐性。这在约旦已经体现出来了。

阿里：你是什么时候第一次遇到亚西尔·阿拉法特的？

萨义德：那是一九七〇年八月的下半月，我在约旦首都安曼遇到了他。那是一次简单的见面。我与他握了手，也就是这么回事。但一九七四年他来联合国总部时，我与他的见面时间很长。他要在联大会议上发言，于是我们就拼凑起来了，他要求我把他的发言稿翻译成英语。此后我就定期见到他，通常是通过在黎巴嫩的巴解组织代表，也就是我的一位密友。我会去阿拉法特的家里见他。在后来的八年时间里，我们互相见面多次。一九八二年春天，我在黎巴嫩最后一次见到他。他躺在床上。我去了他的其中一处神秘住宅，他似乎病得很重。我说，我清楚地知道以色列人要来进攻了。我永远

也不会忘记他说出来的话。他说，如果他们要来进攻，就让他们来好了，我们欢迎他们。意思是，他能够——

阿里：——能够对付——

萨义德：——能够对付。我有一个很亲密的朋友，军事方面很在行，这个我是不懂的。在我的建议下，我们一起去了一趟南方。他察看了在南方的巴解组织防御阵地，认为战胜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我惊呆了。阿拉法特再次表现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面对失败的勇气和意志，认为他能够获胜。这使我一直对他感到纳闷。这也是他能够长期担任领导职务的一个秘密。

阿里：作为领袖和政治家，他留给你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萨义德：噢，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种印象留在了我的心底里。他非常非常聪明。有一件事情一直能够打动我，他总是比他周围的人聪明一百倍，只有两

个人除外，沙菲克·胡特是一个；他身边还有几个人，其中有卡迈勒·纳赛尔，他在一九七三年被杀身亡。

我心目中印象很深的还有阿拉法特的智慧，他的敏捷、他的记忆和他的超强能力。在大批人群前面，他并不见得出色，但在几个或二十个人面前，他就有非凡的能力了，他可以同时开展七场谈话，他可以同时做二十件事情——谈话、接听电话、写字、看电视，全都可以同时进行，全都很坦率，不像许多阿拉伯的领导人。他没有架子，容易亲近。你不会感觉他身边围着一些暴徒——他们不是暴徒，他们是像我这样的巴勒斯坦人——他们不是要阻止你去见阿拉法特。恰恰相反，他们会引导你去见他。阿拉法特总是给你留下他在努力学习的感觉。就拿我来说，一开始他把我当作美国人。我与他之间一场最大的争论——我从来没有说起过——是他把我当作美国的代表。换句话说，假如我是来自叙利亚的一个巴勒斯坦人，来找他谈话，那么我就是叙利亚的代表，不会是其他人。他不明白，在美国人们可以有独立的思想，可以谈及自己的想法，我作为巴勒斯坦人，应该与其他美国人那样，说一些有利于团结的话，

可我却经常批评美国的政策。这个，他永远没有明白。他认为，这里有一个阴谋，一个美国的阴谋，而我被打上了美国人的标记。这很难解释得清。

他也永远没有明白西方。以我的观点来看，他还是没有明白。他认为，资助是一件好事而不是坏事。换句话说，如果你得到了美国人或欧洲人的资助，那么你就丧失了独立。一九九三年时，他就发生了那样的事情。

可他是一个特别的人。他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是：轱辘转个不停。虽然他让你感觉他很坦率，但你根本不知道会在哪里与他见面。每当我要见他的时候，他总是悄悄地与我谈话，把其他人全都支开，然后他就坐在我旁边，所以我们之间有着这样的亲密关系。他会倾听我说话，这是很不寻常的。在阿拉伯世界，这个故事我讲了许多遍……不管什么时候我从美国回来，回到阿拉伯世界，我就会遇到某个人——嗯，爱德华，现在美国在发生什么事情？还没等我张嘴说话，他们就会给我上课，讲述在美国发生的事情，在两个小时的时间里，我根本说不上话！阿拉法特则恰恰相反。他喜欢倾听。所以，你感觉能与他说话。长时间以来，我以为他知道我

在努力从事的工作。但在他逗留贝鲁特期间的最后日子里，我明白这真的是没有希望了。

后来他去了突尼斯，我在他抵达那里的三个月内去见他。我发现他变了，在贝鲁特的失败……原先的做法开始分崩离析。到八十年代中期的时候，他已经在拼命地抓稻草了，这个我是深信不疑的——是他告诉我的，可我还是不能肯定他是不是很认真，但他说：“我不想当穆夫提^①。一贯正确，却不能给人民带来利益。我愿意为人民做点事情，为人民带来点利益。”这个，我是认同的。我认为，妥协是很重要的。我们再也不能延续旧的模式了。

阿里：不能用军事解决。

萨义德：军事解决是无望的！我在黎巴嫩的时候就知道了。在一九八二年的贝鲁特失利之后，我知道得更清楚了。这是最大的一次打击，因为机构、基地和相对

① 穆夫提：伊斯兰教的教法解说人、教法说明官。

稳定的地盘都没有了，转化为以旅馆为家，到处流亡、分散活动。可我不知道他对此事是不是很认真，他是不是真的要做出妥协，而不仅仅是比如组成一个约旦-巴勒斯坦联合代表团。许多巴勒斯坦人反对这种做法。他正在积极争取。一九八八年，搞成了一个妥协，承认以色列并接受两个国家的解决方案。这些我都是赞成的，但我知道他走多远，肯定要比我走得更远。

阿里：嗯，你的巴勒斯坦观点，是这个国家的当局所不喜欢的。

萨义德：是啊，从巴以和平协议的谈判开始，一直到今天，他们都是这个态度。我的意思是，长期以来，我一直是巴勒斯坦的谈判代言人，通过必要的妥协来洽谈巴以和平解决，可我从来没有以牺牲我们的历史作为代价，按照以色列和美国的原則来代言解决方案。我们的历史，应该由知识分子来书写，为的是提醒这个健忘历史的世界，为的是把我们的经历、我们所遭受的痛苦和我们长期以来的愤怒呐喊，都浓缩在十七分钟的片段

上。把这些向他们做一个提醒。自从一九九三年九月以来，已经有了所谓的和平，这实际上是不可能提出批评意见的。因此，在这个所谓的和平之前和之后，我发觉我已经是局外人了。

阿里：之前谴责你是阿拉法特豢养的恐怖教授，向你寄送恐吓信，现在又谴责你不支持阿拉法特，其实都是同一批人，对吧？

萨义德：在有些情况下是的。我认为，那些极力反对我的人，例如称我为恐怖教授的人，是反对巴勒斯坦这个概念的，现在他们认为拉宾是叛徒，而不是我。我是一个已知的坏人，我是恐怖分子，我要杀死所有的犹太人等等。不，问题不在这里，而在与我过去关系相当密切的那些社区，例如自由社区，对于发生的事情颇感遗憾，对于以色列的占领颇感恐怖，嗯，为什么不给那些可怜的巴勒斯坦人一次机会？他们现在对我极为失望，说我是和平的敌人，说我是穆斯林的原教旨主义者——对此我是坚决反对的，还说我已经被抛弃了。现

在的形势下，对于不符合当前所谓的巴以和平进程的话语，是很难很难说得出口的。

阿里：对巴以和平进程，你是不是很悲观？

萨义德：我认为不能说是悲观。因为从长远来看，对于作为一个民族我们能够摆脱这个困境，我还是有信心的。可我对眼前形势深感不安。但愿我错了，但看看面临的形势，对于我们自己、我们的领导层和现实，我心里都很清楚……请别忘记，像亚西尔·阿拉法特及其直属部下那样的人，还从来没有去过被占领土。他们一直在研究他们知之甚少的地形地貌。巴勒斯坦的社区缺乏地图，因此他们依赖于以色列提供的信息。活生生的现实是，我们已经接受了，我们已经在文本上签了字，从而在可预见的未来有效地保证了以色列的占领。加沙是以色列急于要清除的地区，现在已经基本上被以军腾空了，对此巴勒斯坦人是很高兴的，我们理应如此。但需要记住的事实是，以色列依然占领着加沙百分之五十的土地，以军部队还在那里，只是重新布置了。杰里科

是约旦河西岸的一个小地方，巴解组织准备实施有限自治的总面积，大约是六十平方公里，人口在一万至一万两千之间。如果要在那里建立一个国家，相当于要把蝴蝶培育成骏马。可能性只有那么大。在我看来，这是以吵吵嚷嚷的方式，呼吁我们有了一个国家，并坚持对以色列施加压力，认为他们不会实施与巴勒斯坦协议的每一项限制性条款，要求他们放弃。但这样说是不会奏效的。我们的对手以色列是一个有组织的社会，有着强大的经济、军事和技术资源，其背后还有超级大国美国的支持。我认为，这将会是黎巴嫩形势的重现。我们只有巴解组织的几个办事处、一个象征性的自治，但没有获得解放和独立，约旦河西岸十个或十一个小小的行政区，全都在以色列的控制之下，在那里，巴勒斯坦人过着像土著少数民族一样的生活。

阿里：那有什么选择，如果确实能做出选择？

萨义德：选择是很多的。从一九七〇年代后期开始，我和其他几个人负责准备方案，有几个方案要比现

在这个样子好得多了。例如戴维营协议就比这个更好，给了我们更多。在萨达特赴耶路撒冷和阿拉法特亲自否决之前，加沙-杰里科协议已经在一九七七年提交给了巴勒斯坦人。我的意思是，这是以色列想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分散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一个长期计划，其方法是让这两块飞地看到一线希望，也许这就是原因。其次，在我们实际讨论的时间框架中，还有一个更好的选择，那是在一九九一年，当时我依然是参与的，我们不接受临时解决的方案。我们认为如果一开始的时候双方还没有就解决方案的最终模型达成某些共识，那么就不用进行谈判。相对以色列来说，我们力量微薄，我们不能在协议中说，我们同意这个作为临时解决方案，而把最后的状态含糊其辞地一笔带过。

以色列已经得到了可以存在的保证——是我们给他们的——认可、主权以及在暴力下的和平生活。但他们什么也没有给我们，只是承认巴解组织是巴勒斯坦人民的代表。作为载入协议的基本条件，这是不够的。我们是历史上与占领方达成协议的第一个解放运动。历史上还没有其他的解放运动做过这样的事情。

所以，选择是很多的。在我看来，最重要的选择是动员人民。但当前的巴解组织领导层很孤独，关心的是其自身的生存。只是关注自己的生存。这就不能领导人民了。因此我是一直反对的。但我批评的不仅仅是领导层，领导层是会那样做的，他们平庸、腐败，搞投降主义。那是他们的权利！他们感觉他们已经失败了，所以这是他们承认失败的方法。使我感到不安的是知识分子，许多知识分子赞同我的观点，但没有一个站出来说话。因此，我们周围的人都说：“哦，爱德华是卡桑德拉^①。”或者说：“你为什么不看看好的一面。”还有的说：“我们看看能否从中想出更好的办法来。”在糟糕透顶和无法改变的事情中，是找不到更好的办法的。没有批评和讲真话的勇气，是做不到这样的。我认为主要的问题是在这里。

阿里：与解决方案没有直接关系，但现在对阿拉伯世界绝对非常重要的是，在过去的十年间，作为反对力

① 卡桑德拉：希腊神话，特洛伊的公主，能预测凶吉。

量的左翼已经完全崩溃了，我们看到了穆斯林原教旨主义极端团体的发展，他们是利用宗教组织起来的。现在已经形成了系统，在埃及、阿尔及利亚都有存在，甚至在巴勒斯坦社区也有了。像你这样完全不信教的俗人，是怎么看待此事的？

萨义德：嗯，首先这样的组织在各地都是相当不同的。例如，我认为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组织是反对以色列占领的抗议运动。他们关于一个伊斯兰国家的想法，在我看来，还是很初级的，那里的居民根本不会相信。我的意思是，谁也不会去认真考虑建设项目的问题。我问过了居住在约旦河西岸和其他地区的人们，我问他们：“嗯，你们有什么关于经济建设的想法，比如你们对建设发电站和住房的计划。”他们回答说：“哦，这个呀，我们正在考虑呢。”我的意思是，这些方面根本就没有计划，没有具有伊斯兰标记的社会发展项目。所以，我认为他们是一时头脑发热。在他们看来，伊斯兰是对抗目前的僵局，对抗执政党的平庸和失败的一次机会。执政党已经在许多事情上无可

挽救地遭到了损害，与西方与美国结了盟，就像东部的一些阿拉伯国家那样成了欧美的附庸国，失去了信誉，失去了广大民众的支持。在埃及，我认为情况基本相同。伊斯兰运动在数量上是微不足道的。因为想进一步引用《东方主义》哗众取宠，他们受到了西方媒体的操纵，嗯，就是那些疯狂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但日常的生活并没有因此而中断。

阿里：但作家遭到了杀戮——

萨义德：作家在阿尔及利亚遭到了杀戮。我的意思是，阿尔及利亚情况不同——我说的是——

阿里：即使埃及也有这样的情况——

萨义德：法鲁克·福阿德——

阿里：法鲁克·福阿德，是的。

萨义德：没错。但总体上，埃及的社会生活继续处于一种分化的状态。政府没能力提供一切。伊斯兰运动依然是小规模，不成气候，代表了对现状的一种不满。广大人民群众在感情上是倾向于伊斯兰的，他们出于虔诚和反抗而佩戴面纱等等，但我认为，整个社会基本上还是世俗的社会。这些运动想要把埃及或约旦河西岸那样的地方改变成为伊斯兰国家或伊斯兰共和国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我的意思是没有教士。例如在埃及那样的地方，辛迪加等等的世俗团组倒有不少，是由兄弟会组织的。但要搞一个国家，则不是那么回事了。在他们的心目中，更多的是行为规则，个人的行为，衣着穿戴和饮酒与否。但这与伊朗方式的伊斯兰国家不是一码事，对不对？

阿尔及利亚的情况是，民选政府被军方推翻了。阿尔及利亚发生了军事政变，掀起了一场伊斯兰运动，对人们进行灌输。但大多数阿尔及利亚人是反对军事政权和原教旨主义的。我认为，我们正在见证未来伊斯兰世界的一场公开竞争。如果说这场竞争已经结束、伊斯兰是要返回中世纪的某种倒行逆施、伊斯兰已经退缩

了，那么我认为这是对目前发生事情的一种误解。

阿里：你应该看到，阿拉伯穆斯林世界已经经历了……五十年代的一个时期，那时候，纳赛尔是神，是英雄，那时候流行的是世俗的民族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这使得沙特阿拉伯和各地的政权感到很害怕，纳赛尔主义是主要的敌人。这个敌人或多或少发生了内爆。然后就有了左翼、游击战运动，巴勒斯坦人把这些当作伟大的象征和偶像——这是我们必须走的道路——是与激进、民族主义的失败和共产主义的崩溃相连的，现在什么都没有了。甚至这些团组也转向了伊斯兰，伊朗的教训是很吓人的。

萨义德：是啊，这是毫无疑问的。不仅仅是伊朗，还有阿尔及利亚。这么强大和相对严密组织起来的政体的出现，确实是很可怕的。对此我是没有怀疑的，也是反对的。可我认为，即使有了左翼的失败和民族主义政权的崩溃、小民族主义政权的出现——现在大都是这样的政权——激进的结束，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依然还有

反对的文化，其跨度超越了各个国家的边界。埃及的反对文化，是与巴勒斯坦、黎巴嫩、叙利亚、海湾地区和北非地区有联系的，在我看来，这是一种活力的象征，并没有完全消失。

在我看来，一个普遍的问题是民主表达的问题。阿拉伯世界最大的困难之一，是（去找到）一个把事情说出来的方式，我认为这是提供一种新的表达形式的核心，考虑到老同志基本上是不可信的，人们再也不相信他们了。我的意思是，每天在阿拉伯报纸的头版为统治者歌功颂德的做法。人们再也不去关注了。看看阿拉伯世界最大的报纸《金字塔报》发生的事情。该报纸已经成为政府的喉舌，人们再也不去看它了。但在主流论述中也有地下出版物的反对声音。在形成主流宗教模式的选择中——世俗的、阿拉伯为导向的、集体意见以及最重要的，主要问题在阿拉伯世界内部处理解决——各种观点都是相当透明、相当重要的，也就是说，我们与西方世界的关系如何？独立的问题，现在是阿拉伯世界正在讨论的中心议题。如果我们与以色列达成了和平，那会怎么样呢？我们与美国，与西方的关系如何？这些

都是重大的议题。而伊斯兰的回答却是：噢，这些我们都不要，而且我们是反对的。这样的回答是不能满足许多人的，肯定满足不了许多知识分子。我认为，这比通常的信任更为复杂，更为有趣。

五、关于《东方主义》

阿里：我们重述一下要点，一九六七年的“六日战争”改变了你，使你去关心时事政治——

萨义德：是的……

阿里：推动你朝着成为巴勒斯坦发言人的方向发展。

萨义德：先是阿拉伯，然后是巴勒斯坦。

阿里：是啊。《东方主义》就是在那个新时期创作的。

萨义德：没错。因为一九六七年前后我正好在西方，当时我能够认真做好的一件事情，是收集一些剪报，阅读西方写的一些文章，但这些文章与我对阿拉伯世界所理解的真相不相吻合。一九七〇年代初期，我开始明白，我看到的各种误解和歪曲是系统性的。不是出于某个消息不灵的或者是抱有偏见的古怪记者，而是媒体系统的普遍想法，这些误解和歪曲是系统性的，是专门针对东方，尤其是阿拉伯和伊斯兰的东方。所以，在我参与政治的最初几年里，我描写了我认为的阿拉伯人和巴勒斯坦人的真实情况，并与西方对他们的看法进行了对比。

阿里：然后就回到了历史——

萨义德：然后就回到了历史……例如在我写作的时候

候，《巴勒斯坦问题》是紧跟着《东方主义》在一九七〇年代后期出来的。《东方主义》是在一九七八年出版的。《巴勒斯坦问题》其实是在一九七七年夏天写作的。当时我刚刚完成了《东方主义》，但这本《巴勒斯坦问题》也许是在一九七八年才写完的，一九七九年出版了。巴勒斯坦是没有历史的。我的意思是，我不得不重新构建部分的历史。嗯，我不得不修改一下人们所看到的由西方的媒体和学者所书写的正史，然后努力提出我们的真正历史这个概念，我是通过犹太复国主义如何对待我们的视角来书写的。也就是说，我们受到了犹太复国主义的影响，这不是写历史的正确方法，可当时我没有其他资料，只能是这么写了。

我还认为，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开始深信，研究文学其实是一种历史性的进取，而不仅仅是美学。我依然相信美学的独立作用，但那只是美学而已的说法我认为是错误的。文学就其自身来说，是文学的王国、文学的共和国，这些我认为纯粹是胡说八道。那个时候，我认为历史真正占据了 my 脑海。

阿里：所以，你不再相信，如果你曾经相信过，文学能够超越一切？

萨义德：不，不，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我对文学的相信已经越来越少了，其实我已经在尽可能地否定这种观点。

阿里：你对《东方主义》在读者中引起的反响是不是很惊讶？因为在《东方主义》出版后不久，大家都在阅读并展开了讨论……

萨义德：坦率地说，这个我并没有怎么注意，因为我正忙着接下来的一本书。《东方主义》出版的一九八〇年代，我一直很忙，有许多活动和项目要参加。所以，我是大约十年以后才真正去评估《东方主义》产生的影响。可我惊讶了，现在依然惊讶——

阿里：《东方主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萨义德：是的，确实如此。《东方主义》还被翻译成多种语言，而且一直在重版重印，并引发了许多讨论，不单单是对阿拉伯世界，而且还对其他事项。在印度次大陆，我认为人们在争相阅读，在日本、非洲、欧洲和拉美各地也是如此。所以我很惊讶，可我也许应该多加注意。

阿里：依我看来，在某种程度上，《东方主义》被一些支持者所误解了，他们认为《东方主义》是一部正确的政治《圣经》，其实不然。

萨义德：不但这样，而且这个国家的许多保守主义者也在阅读和曲解《东方主义》，还有我们阿拉伯世界的保守主义者，把它作为伊斯兰的卫士，其实不然。

阿里：其实不然。

萨义德：这也不是针对“西方”的进攻，不是全面进攻。我的意思是，关于这本书的整个激烈争论和分

析，在我的心目中是不同意见的充分显示，是对几个见解的组合。但在《东方主义》中的不同意见和不同表达，对这部著作的构想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认为，有些人看这本书是指望能够从中看到有关意识形态的陈述，这个我认为书中是没有的。

阿里：最近，我在重读你的新书《文化与帝国主义》的时候，《泰晤士报》文学副刊的欧内斯特·盖尔纳在书评中提及了《文化与帝国主义》和《东方主义》，他认为，被压迫人民永远正确的观点是你提出来的。你怎么看呢？

萨义德：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观点，也从来没有说过类似的话。这是盖尔纳参与的那个保守反动阵营的观点，他们试图用这样的方法重写殖民历史，使之表明在殖民主义结束后一切都乱了，只有像我这样的西方蠢人才会相信殖民主义是恐怖的事情，因此在殖民主义统治下幸存下来或获得解放的人，是永远对的。对此，我一直持反对意见的。我说过，殖民主义的影响，要比最

后一个白人警察的离去更为深远更为长久。引用弗朗茨·法农^①的说法，我一直相信，在被压迫的人民不再受到压迫的时候，真正的问题就出现了，因为那时候社会变革、民族主义和经济发展就真的成为被压迫人民的责任。这样的观点，根本谈不上正确，我认为是必须坚决反对的。我是一直反对的。

① 弗朗茨·法农：1925-1961，法国马提尼克作家、革命家。

六、关于容纳

阿里：那么，关于目前校园里更为粗率的说法呢？他们相信“政治正确性”，他们引用了你的书，偶尔还提及你，说作家A或B的书是不值得阅读的，因为他是白人，是女人，如此等等。

萨义德：呃，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很悲惨的，因为这很愚蠢，与我的兴趣相差甚远。比如我之所以对简·奥斯汀感兴趣，是因为她是一位伟大的作家，不会

因为她是英国白种女人或者是奴隶主我就要贬低她！

阿里：现在，政治正确性的时尚是相当普遍的，你是怎么看的？还有一种反政治正确性的时尚，有时候想把一切勾销。这些模式，你又是怎么看的？

萨义德：嗯，这有两个模式。一个模式认为，要保持政治正确性就要有选择地阅读某些作家，按照作家的信仰、人种和性别来界定。另一个模式认为，如果在阅读文学或看待文化记录的时候探询政治，那就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的某种阴谋，是在去除西方的文化。这有许多形式。似乎是对西方文化的一种攻击，似乎是促进共产主义的思想等等，换句话说，这不利于西方的自由精神。

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这两个模式相互之间是一种拙劣的模仿，两者都对我坚持的、严肃的、与政治相关的历史文化探究相差甚远。但我的整个方法，不是大量地去对待文化和文化记录，而是密切、小心地关注每件事情，把它放到文化背景之中，最重要的是努力去显

示这些记录在政治上和美学上的矛盾情况。因为文化的本身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样的、杂乱的和混合的。

如果人们认为，我在为有色人种而宣扬有色人种的文学，那么我声明我可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相反，我的兴趣主要是在西方的经典和正规文学。而且，我不仅仅是把那种文学当作杰作加以尊重，而是必须要理解、掌握和喜欢的作品——我认为如果你不在乎是做不到的——还要放到历史的深度中去理解，这样就会产生共鸣。最重要的是，我在谈论的是学术，不是标签，不是我所厌恶的虚幻的政治正确性。

阿里：那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你依然认为你像在埃及上学时那样，反抗主流？

萨义德：是的，完全正确。我从来没有感觉自己属于任何类型的当局或任何主流。我对主流感兴趣，我嫉妒主流，有时候我还羡慕属于主流的人们——因为我肯定不是属于主流的——但总体上我认为他们是敌人。我感觉当局、准则、教义、正统等，其实是我们在反对

的。至少是我在坚决反对的。他们抑制了人们的思想。

我认为，之前我们在谈论的事情，关于政治与文化分开的事情，其实是懒散的。一个重要的当局主张，你们要学习这个，那是因为你们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学习其他的。在我看来，这是懒散和无所事事的宣言。这一切，在我看来最终全都是于事无补的。这一切其实是想维持现状，是我所厌恶和难以容忍的。因此，我就提出了挑战。我认为自己是一个挑战者。

阿里：但你挑战整个正统学说，不单单是已经确定的学说。

萨义德：我挑战我自己！在我看来，主要的斗争——我认为到目前为止是写作和思考等等——是不能让自己形成一种模式，使之可以预测，并受到像我自己过去的工作那样的事情的支配。我没什么时间去回顾我自己过去的想法。我从来没有对学生或学派发生过兴趣。我发觉很难阅读我自己。即使是对我正面描述的事情。这一切全都是我内心的一种不安分，也是我要努力

培育的。

阿里：这是不是也支配了你与马克思主义潮流的关系？该潮流在西方的知识界一直占主导地位，在校园里也是占主导地位的，虽然没有深入到现实生活之中。

萨义德：是的。我认为自己是一个左派人士，但如果是重复公式，尤其是归属的公式——因为我的固执性格和缺陷，我从来不曾归属任何团体——我感觉有时候主张的是一种虚假的社团，对条文的一系列尊重和对权威思想的一系列尊重，如此等等，这是我不能赞同的。因此我可以这样说，在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流中学到更多知识的同时——我的意思是，卢卡克斯^①和阿多诺那样的人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我一直不喜欢一种观点，说这也许是系统性的，这也许涉及了归属，这也许涉及了我感觉只是针对人而不是针对那种系统的某种忠诚。

① 约翰·卢卡克斯：1924年出生，匈牙利裔美籍历史学家。

阿里：这是不是导致了你经常与某些讲究教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矛盾？

萨义德：是的，特别是在第三世界，我自己的阿拉伯世界。例如在《东方主义》中，我有几个页面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印度的观点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但他们安排了一场场研讨会，撰写了一篇篇文章进行反驳，因为他们认为我歪曲了马克思，如此等等。最近在西方，我要么是受到了好多同时是文学批评家的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回避，要么是受到了攻击，因为我的自由主义，因为我的退化的人道主义这一类理由，这一切我认为是可以预见的，所以我并不是很认真地对待。

七、关于知识分子和政治

阿里：但这是一个讽刺，爱德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政治潮流，我不能说已经消亡了，我们可以说马克思主义遭到了重大的退缩，但依然存在，依然在起作用，已经成为一个学科。

萨义德：在这个国家，马克思主义只是一个学科，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运动。

阿里：没有。

萨义德：甚至连理智的马克思主义运动也没有了。有些人自称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们完全脱离了非常重要的政治斗争、政治写作和政治团结的日常生活实践。他们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有些人是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也是学术家，比如弗雷德里克·詹姆逊^①就是一位非常伟大的批评家和理论家，但他并不在政界，在这个世界上我发觉我的盟友不是很多。

阿里：最大的讽刺在于，马克思本人积极参与政治，而他的许多追随者则完全置身于政治之外。是不是啊？

萨义德：是啊，是啊。

阿里：你最近的一本书，关于音乐的那本，里面写

①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1934年出生，美国哲学家、文学批评家、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家。

道：“社会制度、历史愿景或者理论综合，不管多么强大，都无法排除在其范围内的所有选择或实践。总是存在着跨越过去的可能。”你在关于音乐的书中是这么写的，但这实际上也可以应用到所有事物之中，对吧？

萨义德：是的，因为我的意思这真的是一个社会事实。机会总是有的，即使是深陷困境——常常会遇到的——总还有机会做点别的事情。总还有机会可以做出选择，不会只保持沉默或屈服。我认为对我来说这是最重要的社会戒律，在某种意义上也主导了我对政治的理解。因为如果政治只是按照新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以及当今所有其他学派的想法，如果政治只是可能性艺术、结论性艺术和妥协性艺术，那么我认为知识分子就得坚持自己的选择。

阿里：你在英国广播公司的“里斯讲座”中，强调了这个事实，即关于公众知识分子的作用。一位批评家说，这也许是真的，但他为什么忘记了公众知识分子通常是属于右翼或左翼的？

萨义德：当然是啊。这是没有疑问的。我是同情左翼的，我更感兴趣的是对这个世界的观点，这个，我认为是由进步的和左翼的知识分子所形成的，当然在历史上，像温德海姆·刘易斯^①或T.S.艾略特^②那样的人是右翼知识分子，他们形成的和履行的正是那种戒律的使命。我认为这并不局限于左翼人士——这恰好是我的兴趣、我的嗜好和我的同情，但左翼和右翼的情况肯定是真实的。

阿里：可是现在公众知识分子的形象似乎正在加速消失，难道不是吗？

萨义德：不，根本没有消失！我的意思是，在我的意识里也许是在消失。但在我的眼里，这个世界的知识分子并不是很多，可我把他们称作专家和职业人员——

① 温德海姆·刘易斯：1882-1957，英国艺术家、作家。

② T.S.艾略特：即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1888-1965，美英诗人、评论家、剧作家，194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我认为这对知识分子的自由和知识分子的表现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对他们的外交政策这样的领域形成了特殊的压力，要他们对自己的技能和经验实施商品化运作。或者是对非洲的外交政策，或者是对印度的外交政策，或者是对拉美的外交政策，对吧？由此实际上他们就属于一个专家群体了，他们的作用是向当局兜售他们的智力商品。在他们的心目中，原则上是不说真话，或者是为当前的僵局指点迷津，但主要是为了保持现状，取悦客户，真正为顾客服务，不是为了知识分子应该担当的或至少是代表的事业和理想。所以，这不是公众知识分子消失的问题——我的意思是，基辛格一直在上电视，布热津斯基一直在上电视，保罗·约翰逊一直在上电视，他们是公众知识分子，讲的是市场的语言，代表了统治着我们这个世界的大国的想法。

——阿里：可是具有萨特和伯特兰·罗素传统的知识分子——

萨义德：是啊，我认为正在消失的是持异议的知识

分子，主要是因为体制最终既不需要也不能容忍他们。所以，像热内^①那样的人对我是很重要的，热内不屈不挠，毫不妥协——我的意思是，这是一种不可能维持的地位。乔姆斯基也是那样的人。有些人因为其言行或代表的事情与当前的体制格格不入，因此遭到了排斥。

① 让·热内：1910—1986，法国当代著名小说家、剧作家、诗人、评论家、社会活动家。

八、关于美国

阿里：我们暂时回过头来讲讲美国好不好，爱德华？你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好长时间。从各方面来看，你已经是一个纽约人了，可是在你的写作中，你很少提及美国、美国文学、美国政治文化和美国的大众文化。这是为什么呢？

萨义德：嗯，相对来说确实是比较少——

阿里：相对来说，相对你描写的其他事情而言。

萨义德：嗯，我认为在两三年之前是这么回事，后来我写了许多关于美国的事情，美国文学、美国文化，尤其是美国政治。因为美国不仅仅是我生活的一个地方，我把它看成并描写成世界上的大国。美国也许是世界上最后一个大国，肯定是最后的超级大国。我必须承认，我之所以对美国感兴趣，并不是我所说的美国日常生活方面——这是我生活的也因此而赞同的——而是美国在世界其他地区的所作所为，欧洲、中东，以及前殖民地的其他地方。我认为，与以往相比我现在的写作在这方面更为重视了。在我写作的《文化与帝国主义》的最后部分，其实是关于美国的。

部分的，也是由于这种体制的影响。嗯，这个我已经写过了。人们这么做是因为习惯和机遇所逼。

但关于美国的有些事情，并没有引起我多大的兴趣。我没有必要试图改变我自己。这个我已经想过了。例如我应该更多地写一些关于美国的音乐，我应该更多地写一些关于美国的文学。但这事本身并没有让我感到

多大的兴趣，不想集中精力去做。

阿里：你对梅尔维尔^①的兴趣没有对康拉德那么大？

萨义德：梅尔维尔的《白鲸》是我感兴趣的。但我发觉我是间歇性地对他发生兴趣。我在写作有关美国的文章时有一个问题，美国的评论家相当感兴趣，而我则不然，那就是美国人的修辞。美国人的修辞，有一种自编自造的、过度的、夸张的和过头的，再加上某种社会气息的缺乏，甚至连亨利·詹姆斯^②也曾提出过批评，这方面我发觉是缺少吸引力的。我认为梅尔维尔的巨著很特别，与他的其余小说不同……即使《比利·巴德》也真的是某种……这些小说大都近乎寓言，梅尔维尔的其他小说也同样。但《白鲸》是一部想象力很丰富的巨著，我认为是属于世界文学的，因为这方面其视角范围是全世界的。

① 赫尔曼·梅尔维尔：1819-1891，美国著名的作家和诗人。

② 亨利·詹姆斯：1843-1916，美国著名作家。

阿里：美国现代小说家如何？品钦^①、贝娄^②、莫里森^③？

萨义德：呃，我发觉还有少数民族的作家，像唐·德里罗^④和托妮·莫里森那样的作家，比索尔·贝娄有趣得多了。六十年代读了索尔·贝娄《塞姆勒先生的行星》^⑤之后，我对他的小说失去了兴趣，书中阐述的这个国家的民权运动愿景，基本上是一个非洲裔美国人在公交车上脱裤子。在贝娄的笔下，充满了极度的仇恨和强烈的反感——对现代的反感和对新生事物的反感——我发觉它有时候导致文章的虚弱和无趣。

我认为现在不是关于美国写作的黄金时期，肯定不是美国小说的黄金时期。在我看来，关于美国历史的写作更为有趣。除了少数几个小说家之外，例如托妮·莫

① 托马斯·品钦：1937年出生，美国后现代主义文学代表作家。

② 索尔·贝娄：1915-2005，加拿大出生的美国作家。

③ 托妮·莫里森：1931年出生，美国黑人女作家。

④ 唐·德里罗：1936年出生，意大利裔美国著名作家，后现代派小说家。

⑤ 《塞姆勒先生的行星》：原文《Mr Sandler's Planet》可能出错，正确的应该是：《Mr Sammler's Planet》。

里森，她真的是写出了完全不同的脉动，是美国小说的主要特点。

阿里：品钦的作品是相当激进的，爱德华……

萨义德：是的，我很欣赏他的小说《V》。这本书打动了，还有罗伯特·斯通的一两本书，都少有地从美国作家的角度出发，在世界文学中对小说进行了定位。可我觉得，对我的吸引力真的不是很大，并没有比《芬尼根守灵夜》更吸引我，我不喜欢品钦的文学火药味，尤其是其后期作品如《万有引力之虹》的那种深奥……我认为《V》是我真正喜欢的小说。

阿里：你的文章主题经常谈及政治与文化的联系，对于《撒旦诗篇》事件，你是怎么看的？

萨义德：嗯，一开始我在技巧上和精神上被书中沙尔曼·拉什迪^①设置的转折迷住了。我记得在他写作这

① 沙尔曼·拉什迪：1947年出生，印度裔英国作家，《撒旦诗篇》的作者。

本书的时候我还见到过他。事实上，他给我看了书稿，对我说，这将在穆斯林世界引起轩然大波。因此，我知道这本书有一种强大的力量和蓄意的挑衅味道。

坦率地说，我受到了极大的震惊，被来自英国伊斯兰的反响和伊朗的反响惊得目瞪口呆。我认为，这些反响是过度的，还发生了各种骇人听闻的事件。在此之前，针对伊斯兰的传统有过许多骇人听闻的事件，是由外人挑起的，我们的文化遭到了歪曲、诽谤和系统性的贬低，我们的人民在政治上遭到了最可怕的对待。现在，因我们的一员创作一本优秀小说而对作者发出宗教追杀令，我认为这体现了伊斯兰世界已经沉沦到了何种地步。我当即表明站在作者的一边。时至今日，我依然对伊斯兰世界针对这本书的过度反应感到惊讶，反对者其实大都没有看过这本书！我感觉我要尽一切努力保卫拉什迪和《撒旦诗篇》免遭这类攻击……嗯，人们可以从文学角度去批评这本书，但声明这本书不应该被写出或者要追杀作者的做法，真的是表明了我们的地位的沉沦和降低。

阿里：你为什么要在纽约，爱德华？

萨义德：在美国，我真的不能住到其他地方去。纽约是一个流放的城市。生活是残酷的。这套房子不是我的，我只是住在一栋出租的公寓楼里。我感觉我的状态是暂时寄居。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居住在纽约还是不错的。当然，在纽约不会有在家乡的感觉，但我喜欢这样。

阿里：除了背井离乡，你还喜欢纽约什么？

萨义德：我最喜欢纽约的是，它可以让你默默无闻。这是一座有成千上万身份的城市，你可以融入到其中。这也是一座令人惊讶的富有艺术生活的城市，你可以去亲身感受。在美国，没有一座城市能够像纽约一样让你听到上档次的歌剧和音乐会。这是一座媒体的城市，让我感到着迷。这是一个具有多种形象的地方，你可以感受和生活。这也是人造的地方，而且对此不加掩饰。这里没有天生的或者神赐的东西，我喜欢这样。换句话说，这是一个世俗的城市。

阿里：在你生活的这个大杂烩中，你如何看待自己的文化政治生活地位，或者边缘化的问题？我的意思是，人们认为在里根总统执政时期，这个社会转向右倾，其中的自由派人士如鱼得水。因此举例来说，人们在《纽约书评》没有把你当回事。这是为什么呢？

萨义德：嗯，我认为，人们把我当作主流之外，因此是不可接纳的，只是一个象征，或者是代表巴勒斯坦的一个声音什么的。所以是无关紧要的。就像是电视节目，老是要保持平衡，要顾及一边，然后又要顾及另一边。而我经常就是另一边。

可我认为在主流文化中，尤其是在阶段性的文化中，现在是轮不到我来发声的。人们不看我的文章，人们不看乔姆斯基的文章。虽然乔姆斯基在《纽约书评》的成立之初是骨干分子，但他现在不为《纽约书评》写文章了。我们必须依靠的是其他报刊，左翼的报刊，小报刊，偶尔出现一下。对此，我感到很满意。同时，我转而写书，我的书卖得很好，读的人很多，这是我可以

依赖的。我对电视完全失去了兴趣。四五年前，有人要我
为某些主流出版物写文章，但这似乎是我不能够接受的，
因为题目差不多是事先定下来的。我找到了国外的好多
途径，在欧洲和在阿拉伯世界。我每月两次定期为阿拉
伯报刊撰写专栏文章，对我来说，与其在《纽约书评》
现身，还不如这样更好。

九、关于身份

阿里：现在我们谈谈你对自己身份的感受。这方面，你已经写过了文章。但你依然感觉是一个流浪者，或者现在是一名外派人员？

萨义德：不，我觉得我是流浪者。坦率地说，我发觉关于身份的问题，尤其是我自己的身份问题，是极为无聊的。这方面我不感兴趣。我要说，在我离世的时候，我要做的一件事情是脱离我自己的身份，而不是用

某种方法保留身份。纽约鼓励我改变身份，或者成为其他什么的，我喜欢这个主意。不用去顾及数字和成本。

我真的是没有时间去考虑归属于哪个民族团体的事情。我似乎对此兴趣不大，而且这也没有什么用处。我对此事很失望，也感觉没有意思。这种从属关系不如自然的接纳关系，让我更能真正去珍惜。人与人之间的友谊，以及知识和精神的交流，在我看来，要比关于我的身份问题更为重要。

阿里：但世界大同倒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萨义德：是的。世界大同在我看来很可能是乌托邦，我好像不适宜在许多不同的地方生活。但纽约倒是为人们提供了能去旅行的想法。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你在这里，但其实不是在这里。你会有一种间歇性的感觉，旅行的现实是很愉快的。

十、关于个人

阿里：回头想想，在你的人生中的任何阶段，你是否后悔有什么事情没做？

萨义德：嗯，我是后悔的，很后悔没有在我现在从事的工作上花费更多的时间——我在写回忆录。我很想写一部纪实小说，把我成长的那个年代都记载下来。不单是因为我在那个年代成长，而且是因为那个年代至今仍然意味着很多：早年的民族主义、中东的政治斗争年代，

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是时常萦绕在我心头的一个问题——我想努力展现出来——即背叛的问题，诺言的背叛、早期理想的背叛，在过去二十年的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色彩，不单单是在阿拉伯世界，但主要是在阿拉伯世界。

我很想多花点时间，向英语读者提供这本回忆录。这方面的书现在是没有的。我认为，后殖民主义世界，以及九十年代的美国和西方是很有趣的。我后悔之前没有动笔，我希望我现在能够去写。

阿里：你现在已经开始写这本回忆录了？

萨义德：是的，目前我正在写。这是我在那种特殊成长道路上的一份成长记录，我还没有发现与之相同的。我的成长完全受到了特殊的制约，这方面我十分感激我的父母，他们为我的成长在埃及和巴勒斯坦创造了一种神话般的世界，但主要是指埃及以及此后的黎巴嫩。在一个封闭的天地，脱离了周围的环境，可以实现自我想象和自我价值，这在我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只要能够，我很想偿还这个。

阿里：纳赛尔和整个纳赛尔运动的浪潮，对你们家庭产生了什么影响？

萨义德：哦，这个就很有趣了。我父母在思想上坚定地拥护纳赛尔，尤其是我母亲。别忘记，我的双亲都不是埃及人，他们来自巴勒斯坦，但纳赛尔对其他阿拉伯人的号召力，最终比对自己的埃及同胞的号召力大得多了。所以一方面，他被视为巴勒斯坦人和泛阿拉伯政治的领袖，这对我有着重大的意义。另一方面，自五十年代后期开始，我清楚地认识到，在我们全家依然居住的埃及，纳赛尔还代表了残酷镇压和秘密警察，至今依然可在埃及见到，这使我感觉很恐怖很丑恶。因此，我对他的感情一直是很复杂的。我很欣赏他。我回忆起一九七〇年他去世的时候，这里的几所大学邀请我去专为他设置的灵堂上讲话。我拒绝了，我不能那么做。我对他的感情使我内心感觉十分紧张，那是混杂着羡慕和厌恶的感情，所以我对他不可能是很热情的。

阿里：你母亲是什么时候过世的，爱德华？

萨义德：母亲是一九九〇在华盛顿去世的，一九九〇年七月。父亲死后，母亲住在贝鲁特。父亲是一九七一年年初死的。母亲继续住在贝鲁特，经历了黎巴嫩内战，经历了一九八二年的贝鲁特围困。事实上，当时我的一位密友易卜拉欣·阿布-卢格霍德碰巧也在贝鲁特，他的公寓被炸之后，在围困期间他就搬到我母亲的房子里来住了。母亲很坚强，她艰难地挺过来了，但到一九八三年她患上了癌症。在生命中的最后六七年时间里，她是在贝鲁特、华盛顿和纽约之间度过的。最后的一年很惨，因为她的意志迅速消退了。后来，我们发现这是被癌症摧毁的。

可是在母亲活着的最后几个月里，在她临死的时候，他们在这个国家启动了针对她的驱逐程序。这事颇具讽刺意味。因为母亲从来不是美国公民，她无法取得美国国籍，因为她没在这里居住过。所以，她的身份从持有通行证的巴勒斯坦人，到巴勒斯坦裔的黎巴嫩公民，再转为在这个国家不受欢迎的客人。我妹妹也是与

她一起居住在华盛顿的，在母亲去世后一个月内，妹妹不得不出庭，面对法官解释她为什么不应该受到驱逐的理由。因为他们要驱逐她——她的签证过期了。因此，这是母亲在世最后几年一个讽刺事件。

阿里：你母亲的离世，是不是让你感觉到你需要重新唤起对这个世界的认识？

萨义德：是的。母亲死后的一年时间里，我发现我生病了。这两个事件的发生，在我生命中第一次让我相信，人总是要死的，不能继续我过去的那种活法了。在我从医院回来发现我得病之后，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坐下来给母亲写了一封信。母亲已经过世一年左右了，我只是想把我的感觉与她分享，并在某种意义上努力接上我认为已经断裂了的一种延续。然后我想，我应该用散文的形式来记住这个特殊的世界——不单单是母亲的，也是母亲和父亲的，也是妹妹的——这事我以前是从来没有做过的。我这么做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在我看来这是很重要的——我这么做并不是在履行一个知

识分子的使命，也不是要完成那种政治任务什么的。这是我要做的一件额外的工作。

阿里：是不是也想在这个世界上给你的孩子留下点什么？

萨义德：是的，事实上在母亲死后不久，我开始计划带上孩子们回到中东去。当然，孩子们在小时候经常去黎巴嫩，但从来没有去过巴勒斯坦，也没有去过埃及。所以，我们旅行了几次。我渴望在巴勒斯坦与孩子们建立一种共同的纽带，在那里，他们可以看看我出生的房子。但我不能进入到房子里面，这是我最大的遗憾。当我们看到在耶路撒冷的那座房子，我出生的那座房子的时候，我能做的只是用手指头指点我出生的那个房间的窗户。女儿说，你不想进去吗？我回答说，不，我真的不能进去。这对我来说，真是太过分了。然后我们去了拿撒勒，看到了母亲的房子。此情此景，心中颇有几分伤感，但在我的心目中，事情就此彻底结束，这在我的人生中是第一次，以前我从来没有设想过，也从

来没有尝试过。

▲ 阿里：你与孩子们的关系怎么样？在你身上有没有你父亲的影子？

萨义德：呃，在与儿子一起的时候，我发觉最让我困扰的事情，是在我与儿子的关系中我也许会以某种方式重复父亲对待我的经历。可儿子一点儿也不像我，他的娱乐感健康得多了，他比我更加不拘礼节。我认为，我与他在一起比父亲与我在一起时感觉更为自由。他对我的了解，比我对父亲的了解更多。

父亲对我真的是一个很大的谜团。他言语不多。记得我在学校里的時候，父亲会每月一次写信给我，让他的秘书把信稿打印出来，他总是在末尾写上“你忠诚的”然后签字。我向母亲抱怨说，父亲为什么要写给我这种正式的信件？我马上接到了父亲的一封信，是手写的，信中说，“亲爱的爱德华，你母亲告诉我说你不喜欢打印的信件，因此我现在寄给你一封手写的信件，你忠诚的，沃第尔·萨义德。”这简直是一种恶搞，可我儿

子与我的关系，则更为自由更为开放。

我女儿与我儿子很不一样。女儿对阿拉伯世界根本不感兴趣。儿子喜欢阿拉伯语，有过学习和研究什么的。女儿是那种欧美化的女孩，喜欢表现自己。她对演艺感兴趣，我与她的关系也要比我与父亲的关系更为融洽、更为愉快。

阿里：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理论问题，过去一直没问，现在想问问：一个严肃的知识分子，有没有可能同时也是一个衣着讲究的人？一个严肃的衣着讲究的人，有没有可能同时也是一个知识分子？

萨义德：这两种情况都是完全可能的。我认为，只有严肃的知识分子，才可能会对仪容仪表感兴趣，因为仪容仪表是很重要的。而且只有严肃对待仪容仪表的人，才有可能成为严肃的知识分子，在乎心灵的感受。因为心灵的感受只有在证明外表吸引力的时候，才会是有趣的。

阿里：好吧，今天的谈话就此结束。